

第三屆  
勞動青年自覺營

工人不靠護身符，  
革命自救不當奴！

2017 9.9 (六)-9.10 (日)

傳說中的...

馬克思主義青年研習營營隊

我們這年代居然還有  
這麼教條的營隊！



營隊手冊



主辦單位：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 ►高教工會簡介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成立於 2012 年 2 月 18 日。

我們決心要團結高等教育機構的所有受雇勞動者，共同來：

- (1) 維護勞動條件與尊嚴，
- (2) 推動大學治理民主化，
- (3) 促進學術自由與教育資源分配之公平正義。

身為高教的一份子，我們目睹了向下沈淪的高等教育。當前高教主要的問題正在於：國家與大學完全以市場導向的表面績效為目標，犧牲了教師的勞動尊嚴與窄化了大學精神。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以及扭曲的評鑑制度，造成校園民主與學術勞動的自主性逐漸消失，並損及學生的受教權益。高教工會將致力於推動高教的公共化，保障學術自由與校園民主、促成教育資源的分配正義、維護高教勞動者的尊嚴，並推動高等體制中的勞工教育。

## ►►勞權小組及行動小組

針對學生勞動者、兼任助理、或是其他校園勞動議題（例如兼任教師），工會希望能在各校發展「助理與學生勞動權益促進小組（簡稱勞權小組）」或「行動小組」，已成立的有：世新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台灣師範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興大學、陽明大學，以及淡江學生聲援兼任教師行動小組。成立小組並無人數門檻規定，只要助理與學生有意願，且有足夠人數能夠運作該組織，工會都會盡力協助。

##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

直撲青年勞動者的，是勞動處境的整體惡化，以及面臨貧窮化的危機。然而，危機也是改變的契機，加劇的社會矛盾成了我們得以對當前問題提出分析、並進一步凝聚為實質行動方案的突破口。青年行動委員會深信，改變的可能就掌握在青年手裡，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就可能重新打造實現自我的未來！

## 2017 勞動青年自覺營課程表

時間	9月9日星期六	時間	9月10日星期日
09:30~10:00	報到	08:00~09:15	早餐
10:00~10:10	高教工會介紹	09:15~09:45	移動(中山國小→東門站)
10:10~12:00	破冰/開場 〈沒有失敗，只有暫時停止成功〉	10:00~12:00	課程三 壓迫還是解放？—挑戰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陳政亮)
12:00~13:00	午餐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課程一 馬克思主義在今日：內涵、意義、為何不是教條(林柏儀)	13:00~16:00	圓桌論壇 青年組織者的回顧與反思
15:00~15:30	休息	16:00	賦歸
15:30~17:00	青年勞動工作坊— 慣老闆幹話大賽		
17:00~17:30	小組討論一		
17:30~18:00	移動(東門站到→中山國小)		
18:00~19:00	晚餐		
19:00~20:30	課程二(趣旅館餐廳) 社畜是怎麼養成的？(陳信行)		
20:30~ 21:30	小組討論二		

### 分組名單

第一組：陳景瑄、陳賀煦、許鈺鈴、謝忠賢、鄭子薇、陳諺樑。

隊輔：俐瑩、航江。

第二組：邱宇弘、黃品慈、韋榮威、李孟儒、王紫菡、馮寧默。

隊輔：張郁、子軒。

第三組：李郁苓、林芳曲、林風吟、林郁芳、許陳品、諶其驪、  
溫芳怡。

隊輔：毅弘、容渝。

## 課程參考書目：

課程一：馬克思主義在今日：內涵、意義、為何不是教條（林柏儀）

〈真實烏托邦〉第 3 章（在本手冊後半段）—<https://goo.gl/6cXMsB>

課程二：社畜是怎麼養成的？（陳信行）

〈勞動與壟斷資本〉第 15 章到第 18 章—<https://goo.gl/gMsWCb>

課程三：壓迫還是解放？—挑戰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陳政亮）

〈學術生產與知識分子：高教工會的實踐〉，《台灣社會研究》第 98 期—<https://goo.gl/EKTVNJ>

## 圓桌論壇：

年金：社會保險的失敗——從勞基法到勞工退休金條例—<https://goo.gl/YUTdTn>

勞基法：一例一休懶人包—<https://goo.gl/KdKxvW>

兼任教師：一體適用勞基法懶人包—<https://goo.gl/rXb8r4>

境外生健保：英特耐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https://goo.gl/cMDfsd>



## ■ 課程三：參考讀本

學術生產與知識分子高教工會的實踐 文／陳政亮（《台灣社會研究》第 98 期）

關於這個題目「學術生產與知識分子:高教工會的實踐」有下列兩個討論的焦點:第一，討論當前環繞在學術生產的諸多制度性安排，並分析其背後的理念。二、討論知識分子分析這些制度的論述，聚焦在工會是在什麼樣的知識立場上面對這些問題。簡言之，這個報告大綱是先從具體的經驗開始，進而分析其背後的價值立場，然後討論實踐的可能。

### 一、概念與現象

近十幾年高教變遷劇烈，有人認為是高教的「商品化」現象。確然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學費調整的議題上，反高學費運動者經常以「反對教育商品化」作為訴求;此點同時也間接的顯示了整體社會把學生視為是「消費者」，而學校則是「商品的提供者」，這種「商家與消費者」論述的確也非常普遍。不過，如果我們把其它的變化納入討論，如:系所與教師評鑑、升等條款、不當解聘、彈性雇用、大學擴張、頂尖計畫、法人化……等，商品化這個概念就不夠用了，畢竟這些複雜現象所指涉的，是關聯到國家的角色、大學內部管理的變化、乃至於高教整體勞動風貌的轉變。我覺得要用「市場化」這個概念來涵蓋「商品化」，會比較準確一點。所謂「高教市場化」就我的觀察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教育乃是作為「知識經濟」的一環，提供給市場(企業)相關的技術。在現實面上，此層面主要是以「產學合作」與相關的政策構成的。當然，這也包含了各級學位生「技術人才」的培養，以及實習等制度。第二個層面是:大學的「自我產業化」。換言之，大學不僅是提供市場「知識」與「人才」，甚至將自身也都產業化了。這倒不是台灣本地的現象而已，事實上 1990 年代中期 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已經把教育視為是服務業的一環了，並且在全球範圍下相互競爭。

### 二、市場化中國家的角色

一般商品生產後於市場中買賣，對於生產者與中間商是有利可圖的，消費者也會把商品「用掉」。但是大學所生產出的「知識商品」，其實並不具有「被用掉」的這種性質，反倒是「愈用愈多」，「愈用愈豐富」。「知識」也者本身是透過人類分享才有可能成立的，此點亦呈現了知識

財產權的錯誤思維。而為了要完成這個知識生產的目的，大學愈保證分享過程的順暢，便愈能完成豐富知識的目的。換言之，大學運作根本的邏輯(以分享為前提)，其實不可能與市場中產業運作的獲利邏輯(追求自己企業利潤的最大化)一樣。

問題在於:那被錯誤的視為「產業」的高教，到底該如何自我證明「獲利」?的確，我們可以從學校年度「盈餘」來計算;然則，它在性質上並非如此。只要提高了對學生的單位投資(更多師資、演講、參訪、實作、設備……等等)，這些盈餘就馬上消失了，而決定投不投入更多資源在學生身上，並非像市場一樣為「行情」所決定，如果我們願意(其實也應當)，可以把所有「盈餘」投入在幫助學生的學習上—這正是教育的目的;那麼「盈餘」(利潤)的概念就不恰當了。換言之，這個「非市場狀況」使得判斷「獲利」有難度，從而也使得我們無法從利潤多寡來斷定大學辦學的效率。

雖然在「消費端」看不出來，「企業」倒是可以從「生產端」來看。「知識生產的效率」的確是可以被量化的，畢竟每個教師(與博士)一年生產出幾篇文章、幾個科技部計畫、畢業了多少學生、參與了哪些研討會……等，只需初級統計就可以搞定了。那麼延伸出來的「生產效率統計」就可以無限制的蔓延;各種的「校務評鑑」、「系所評鑑」、「教師評鑑」就這麼浮現了。而近距離的看，這是國家介入之後發展出來的東西，正是所謂「建立指標」的工程。高教評鑑中心基金會與台灣評鑑協會這兩個由教育部支撐住的準國家機構，所做的工作便是如此。

那為何這些指標是由國家介入而設立的呢?我認為這牽涉到國家對於教育的看法。國家基本上認為教育是市場中的服務產業，這是它的意識型態，從而在政策上「協助了市場建立指標」。因為這個市場還不懂得「如何競爭」，於是它便執行了「國家協助市場、擴大競爭」的功能:一方面扶植各校建立評鑑指標，另一方面也宣告這些指標將是各校競爭獎補助款的判準。

基於相同的市場競爭意識型態，國家也對教育解除了諸多的管制。譬如，逐步同意各校擴張、實質降低諸多管制(財政、人事)、開放陸生、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退場過程中的私人董事會獲利……等。除了解除管制，它更進一步扶植特定企業，例如，將資源集中以營造特定學校之競爭力(五年五百億)、把大學推向市場/讓市場力量進入大學(這是成大自治自理/法人化的

案例)、以獎補助款拉近市場與學術的距離(產學合作)……等。

我稱這是一種「意識型態」的用意在於指出，這種想法根本上無視於「教育難以用市場觀點來運行」的現實，而在國家大力推動下，教育看起來似乎真的是變成了市場的一部分。

### 三、自我產業化下的「績效」現象

大學自我產業化在校內產生了巨大的效果，主要是競爭的意識型態在校園帶來的績效管理主義。很難相信台灣高教中會出現這麼多毫無意義的指標，根據我們的調查，有的技術學院甚至有超過兩百種以上的教師評鑑細項。績效同時也反應在升等制度的設計上，從 2006 年以來在全國蔓延開的限期升等條款(不升等就解僱)，幾乎所有學校都相繼採用。

績效也出現在學校經費的控制上，特別是人事成本的縮減，導致彈性雇用大量增加。例如，原先應當是專任聘用的教職，改為短期的專案聘用，或有所謂約聘教師的出現，在這種狀況下，大量新科博士淪為到處流浪的兼任教師。而不論是何種狀況聘用的教師，其勞動條件都惡化了：有的增加了責任鐘點、行政責任，有的採取了大班制，甚至有所謂「人時制」(依照修課學生的人數來計算教師學分)。在薪給方面，透過評鑑控制各項的薪資懲罰辦法，有的學校以教育部部訂的生師比標準(最低標準)來解聘「超額教師」，有的有所謂配額升等(各院有一定名額)、限制升等(得先義務當過行政)等辦法。或者透過要脅教師簽下不平等的附帶契約，增加教師的工作量。更別提一些學校扣薪、減薪、欠薪、減鐘點費、導師費、暑修費，以及年終獎金。而在這個趨勢之下，學生勞動者的勞保與勞退，校方也都刻意的不願意繳納，導致青年勞動者巨大的損失。

為了擴大財源，調漲學生學雜費變成了校方的主要策略。雖然教育部在學雜費有個管控的機制，但仍被大學逐漸衝破，更何況像是研修生與研究生的學雜費一向都是校方自治的範圍。大學對於社會大眾的招生並非著眼在於社會教育，雖然美其名為終身教育，其實主要是為了高額的學分費，各校廣開學分班、在職專班、夜間部、公務人員訓練班……等等，目的都在於大量的經費收入，至於所提供的教育課程是否公平與實在，並不是真正考慮的要點。產學合作是另外一項能夠獲得國家補助的項目，因此也就成為教師評鑑裡頭重要的標準之一。

#### 四、市場化下的教育後果

市場化同時也會在文化領域中深化，當一個教師無法對抗自己的學術環境，只能被迫沉默時，庸俗化的學風很快就會蔓延全國。我們觀察到幾個嚴重的後果。首先，缺乏真正的學術自由。由於偏狹的學術成就標準與錯誤的限期升等辦法，導致一整個世代的年輕學術工作者失去創造能力。特別是限期升等辦法在 2006 年之後普遍的實施，迫使當前四十歲以下的年輕博士深陷在失去工作的巨大壓力中，只能從事「短期有效」的工作。

而這一點則與「缺乏勞動保障」相關連。白話的說，沒有工作權保障作為前提，學術思考便會服從行政管理單位的「期望」一短時間內的績效成果，這也是為什麼當前「炒短線」的學風熾盛的根本原因。而如上所述，在成本考量下，我們也看到從凍薪到扣薪等等的處罰。學術工作者感受自己成為「被管理」的對象，進而失去工作熱誠，最後則變成績效主義下的異化勞動者，自我將學術工作與生活的意義分離，工作變成只是純粹餬口而已；非常弔詭的，「混日子」據說是績效管理主義最想要去除的工作態度，沒想到它竟然自己製造了這個現象！

整個校內的管理主義作風，還帶來了行政系統權力的高度擴張，以及強化了教師之間的階級區別。事實上，在大學之中的權力階序本來就是以正教授為最，而一個大學教師的職場生涯從助理教授(或講師)到正教授，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學術地位與薪給的提高，同時也是權力的增加。若校園中行政權力高度擴張，也代表了處於行政位置的正教授與其他層級教授權力的區別擴大，這種權力上的區別非常不利於知識上的分享與討論(這倒不是說所有正教授都是追求權力者，而是說明一個普遍的權力現象)。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部分正教授(透過計畫)要求同計畫內的助理教授(或者專案教師)不成比例的付出，這種教授對新科博士赤裸裸的支配關係，過去很罕見，現在則成為年輕學者不斷口耳相傳的普遍經驗。

如果說各大學是(向著教育部)玩著獎補助款的競爭遊戲，那麼，教育部的退休官員在這當中就成了炙手可熱的私校門神。這種風氣蔓延到各私校，形成惡性競爭，能靠關係的靠關係，不能靠關係的就公開批評別人靠關係，導致整體的學風庸俗而市侩。甚至連學科的變化都著眼在立即可用的現實性上。技職體系的工科遭遇到最嚴重的打擊，因為大家都忙著設立新的「觀



光」與「餐飲」(畢竟有「吳寶春」的鼓舞，讓這些科系看起來非常有錢途)，機械相關的科系就註定要被丟到一邊去，雖然社會的確需要工科人才。

其實從學生角度來思考，教授為了升等與評鑑努力去寫文章，忽視了教學的工作，本來就是傷害學生受教權的事;再者，各校不斷企圖調整學雜費，完全不考慮社會分配的後果。最後，學生進入大學之後所習得的東西愈來愈狹隘，愈來愈技術化，缺乏人生意義的追尋，只剩下市場相關的學習而已。

缺乏學術自由與勞動保障、行政系統逐漸擴張權力、整體學風變得更為庸俗、學生受教權受到傷害，這便是高教市場化下的社會後果。

## 五、高教工會對抗市場化的論述

在知識領域之中，「如何對抗市場化」有許多不同答案。工會內部當然也充滿了不同的論述方向。這些論述大約可以區分為下列四種(未必周延且互斥):權利論述、人文論述、批判論述與左翼論述。

權利論述主要是認為:每個人都有平等的受教權利，不能因為階級、性別、種族、年齡等因素造成差別待遇。再者，說是一種「權利」同時也表示了這是國家應當要提供的公共服務，而非市場中的產品。這個論述對於對抗教育商品化特別有力，在運動現實上，經常成為反對調漲學費運動的論述主軸;畢竟如果教育成為具有不同價格的商品，那它將會排除特定階級的享有。當然，從「教育作為一種國家應提供的公共服務」這個意義上來看，學費問題不僅不應當調升，且應當要逐步做到免學費才對(事實上，高等教育逐步做到免學費，是在 2009 年我們已經簽下的兩公約的具體內容)。

延伸此權利論述的「公共服務」概念，則是關於大學公共性的討論。這一個議題又因為當前私校退場過程的諸多弊端而被社會關注。邏輯上來說，私校存在的意義在於教育之公益性，它本身的過去所集合之公共資產(董事與其它個人捐助、國家預算、學生學雜費……等)，在退場過程中是否能夠由不斷更換後的最後一批私校董事會成員來清算處理(得利)，而不需經過嚴格的公眾檢驗，本身就是個問題。更進一步說，私校的資產在平時就經常被控制在一個極為不

透明的董事會手上，其中的利益交換與公產私用迭有所聞，過去私校董事成員被判刑者亦所在多有，這與教育公益的理念何其相違！遑論當前為了酬庸或門神性質而延聘的教育部退休官員（或二春教授），更顯現出私校以私利謀求私下交易的畸形結構。最後，以公共性的角度出發來看待公立大學，我們面對到的是一個即將「法人化」（或「自主自理」，而其實是「公司化」）的成功大學，這個由公立轉變為「公司法人」的變局，令人擔憂的便是它將來的決策機構內涵了私人企業力量，這恐怕會更進一步破壞原有的教育公益性。

無論如何，權利論述對於市場化的對抗，主要集中在「受教機會」以及「教育公益」上，但對於教育內容應當如何，並沒有特別說明。關於內容的對抗，有部分是由諸多人文社會學類的教師所發展出的「人文論述」來擔任的。這一路認為大學教育應當培養的主要是公民素養、人文氣質、通識精神、或者所謂的博雅文化，對於當前教育中的粗鄙、庸俗、市創與急功近利的風氣特別不以為然。因此，對於各式的評鑑制度（含限期升等的制度）、論文生產效能的形式主義、偏重市場的學風、純技術性的教學、異化的學術生活……等，都籠罩在它批判的彈幕。不過，這個廣義的「人文論述」最值得討論之處是：它的邊界模糊，內容包含了許多感受性的修辭，甚至有時也會讚嘆著某類型的市場——只要它能呈現出某種優雅。

批判教育學，雖然在台灣一直處於教育學門的邊緣地位，在西方的確是對抗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之一。受到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中南美洲受壓迫者教育學、與西歐左翼人民民主論述的影響，批判教育學內在涵蓋了複雜的理路。幾個主要的觀點是：自我在日常/校園實踐中學習，創造有意義的智識成長、透過平等的對話教育而非「囤積教育」趨向真正的人性解放、面對差異而能去除多重壓迫（階級、性別、種族）的權力關係。事實上，這不僅是一種教學方法（對話、實作/實驗、反思），還有具體的目標（人性解放、智識發展、去除壓迫關係），甚至把教育本身視為一種社會革命。與其說批判教育學是對抗市場化的論述，不如說是對抗「所有」既存的教育體系，它對於服從於各種（政治、市場、種族、性別）權威的整體教學體制的高度批判力，要求從學生如何可能成長的角度來思考教育的解放本質，以及教師（作為行動者）的角色。因此，在論述上它的確能夠產生對於市場化之下狹隘的技能學習、受限的學術自由、高漲的行政管理權威……等整體風氣的批判，只可惜批判教育學在台灣仍屬於低度發展的領域。

不過，批判教育學內在仍與左翼思路保持著複雜的聯繫，有些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功能」的批判論述，同時被批判教育學所承認；或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擴張，部分批判教育學者也集中對資本主義展開批判。從左翼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下的學校教育有著意識型態(對競爭的認同)與勞動力(技能養成)再生產的功能；如果這樣說太過「再生產論」(reproductionism)的話，那麼更曲折的故事可以是：學生為了對抗學校權威而自願的重複藍領工人階級的工作(learning to labour)。不論那一種版本，教育作為一個對抗的場域，值得行動者進一步在論述上揭露意識型態的虛偽性，這不僅是為了受教育者之解放，主要是為了打斷意識型態再生產的環節，進行整體社會的改造。關於左翼的教育論述微妙之處在於：當人們企圖改變此再生產的環節時，同時也把勞動力的養成當成是錯誤。這的確是很奇怪。勞動力的養成本質上不可能是一種錯誤，即便是新社會也需要勞動力。左翼若在這裡一併把勞動教育丟棄到一邊去，視技能(職業)教育為資本主義的捍衛者，或是異化勞動的起點，可能導致一種教學內容的「人文論述」或「批判教育學」的轉向，要不回到人文論述去陶冶學生氣質。

就是轉進到批判教育學談人性解放，從而忽略了勞動本身帶來的潛在對抗能力。後設的說，或許左翼的教育學者總是有著人文主義的底蘊，對於勞動教育缺乏同情的理解。左翼應當要發展的是新型態的職業勞工教育，以批判的角度理解勞動現場(包含勞動法規、技術能力、公司文化、企業分析、工會組織、諸權力關係……等)；換言之，並非要求取消職業相關的教育，這既不可能也不應當，而是要求一個進步的職業勞動教育：現實上，既然教育被當成職訓的一部分，它就應當包含著進步的勞動教育；理念上，既然勞動本身是人們的自我完成，它本身就應當是教育的一部分。

事實上，工會在校園內的組織本身就是勞動教育的一部分：眼下工會於校內的對抗，如：評鑑指標、限期升等、彈性雇用、勞動條件降低、人事成本降低、違法資遣、濫用學生助理……等，都是在養成對抗市場的個別受僱者(這當然包含學生在內)。更進一步說，當工會的對抗進展到一定的成果時，進步的勞動教育納入普遍的課程也是很自然的事；此時，大學已不是培養順服勞動者的場域，而是打造具有戰鬥意願的各式勞動者的基地。

## 六、工會實踐的領域

對抗市場化的論述的龐雜，一方面反映出工會組成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也側面的說明了高教改革的複雜度。因此，工會所面對的日常鬥爭亦極為廣泛，這大致上又可以參與工會的幾種身分別(專任教師、兼任教師、職員助理與學生勞動者)來區分。以議題上來說，則可以區分為：勞動保障、學術自由、社會正義、參與自治……等相互關連的項目。而這每一項都可以延伸出更多更細緻的討論，有些戰鬥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過，因為篇幅的限制，只得暫時略過。

無論如何，過去這十年來，我總是聽到知識分子對於身處教育環境的諸多抱怨，部分是慨切陳詞，半是懷舊感傷，最後總是自我放棄，整體聽來則像是一種宿命論的悲調。我想知識分子若認為無法改變這個世界，甚至喪志到連限期升等都覺得不可能改變，這恐怕是讀書人最大的悲哀。工會當然反對宿命論，它不僅要翻轉當前的市場化傾向，還企圖建立一個更為進步的高等教育體制;這並非是乞丐許大願，而是真正可以達到的目標。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高教工會是由大專教師、職員與學生共組的產業工會。以產業別組成的工會形式而言，本身在台灣就是全新的團結經驗，就工人運動組織上的嘗試來說，包含眾多身分如何團結在一起也是新的挑戰。我當然無法預測如此的團結能夠走得多遠，特別是當專任的大專教師同時對職員、學生助理具有某種雇主責任時，我們該如何站在一個恰當的基礎上自我檢視與面對內部勞資對抗的張力，是一個艱難但饒富意義的課題。然則，具有深刻意義的勞動者團結過程中，總是會浮現令人興奮的時刻。

前一陣子，由教師、職員與學生共同組成的高教工會台師大分部進行了某種戰鬥上的實驗：由學生會員在校內挑戰教師的限期升等辦法，雖然這並非是學生勞動者「自己的」議題;她們正在試圖超越某種勞動利益取向的工會主義的限制。即便此案無法在台師大的校務會議上有所突破，我總覺得當勞動意識(與其教育)深化到某個程度，它所能帶來的團結與改變現狀的潛力，遠遠超過狹隘的工會主義所能想像的邊界，我甚至(意志上樂觀的)認為工會內蘊的平等、民主與解放的理想，能跨越更多人民民主團結的障礙;在這個意義上，身處於後多元人民民主的歷史時刻，我們也許得重新估量工會這個百年來傳統左翼的戰鬥基地，莫棄之如鏽劍封鞘，應令之金光閃耀。



## ■ 圓桌論壇：青年組織者的回顧與反思

本營隊將是高教工會與學員一同探索議題、實踐行動計畫一環，從 9 月至 12 月，分為三階段：暑期營隊、議題實踐——定期聚會與座談、成果分享會。

第一階段：「營隊」（9/9-9/10）

A. 馬克思主義在今日：內涵、意義、為何不是教條

講師：林柏儀（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

B. 社畜是怎麼養成的？

講師：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C. 壓迫還是解放？——挑戰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

講師：陳政亮（高教工會秘書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D. 青年勞動工作坊：慣老闆幹話大賽

E. 圓桌論壇：青年組織者的回顧與反思

第二階段：「議題實踐——定期聚會與座談」（10-12 月）

營隊期間由工會統籌、學員分組選定感興趣的勞動、高教相關議題，並與高教工會的專職工作者、青年組織者一同思考生產具體的行動計畫。從營隊結束後至 11 月底將定期聚會，討論如何實踐計畫，並有定期座談，深入探討青年勞動與高等教育議題。

第三階段：「成果分享會」（暫定 12 月底）

預計將於 1 月舉行一場分享會，由學員報告歷經三個月，參與議題、落實行動計畫的心得感想與成果分享。

在暑期開學前的營隊結束後，我們將帶領學員一同進入第二階段討論行動的部分，以下是幾個由我們選定的幾個主要議題：

## 一、年金改革：

近日，新聞指出勞保局統計今年勞保基金提前出現收支逆差，早於精算報告評估 2018 年首度產生收支逆差的現象，因此引發基金也將提前破產的恐慌。事實上根據過去的精算報告，勞保基金將於 2027 年破產，可見思考勞保年金如何改革、尋求財源永續之道已是刻不容緩。

然而，根據今年已落幕的年金改革國是會議，政府所端出的「改革」方案，竟只是停留在「多繳、少領、延後退」的思維；並且，以「解決世代不正義」等話語，來遮掩此減法思維實質上就是增加勞工的負擔、加劇老貧生活。根據勞動部資料，目前退休勞工平均僅月領 16,179 元，以低於基本工資的退休金過著毫無保障的老年生活。

而蔡政府的方案為「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期間從 60 個月逐步增加到 180 個月」，實際上將讓未來的勞保老年給付平均少領 18%；進一步，就算年金最後順利改革，勞保破產也僅能延後 2 年。也就是說，在「財務平衡」的減法思維下，凸顯民進黨政府只想要將問題再往後延，而非真正改革勞工退休保障權益的問題——事實上，少子化結構以及經濟成長未能反映在薪資成長、造成勞工薪資低落等問題，才是年金破產危機的真正根源。然而，政府非但未積極改善整體薪資倒退、生育率低落等危機，卻只要求低薪的勞苦大眾領取更少的年金，謊稱這樣可以解決危機、還是一種「世代正義」。我們認為，民進黨政府傾斜於資本的需要，讓資本家盡情剝削勞工，將嚴重惡化勞工的老年生活品質。

今年 6 月 27 日，公務人員年改三讀已通過，在下個立法院會期勞保年金改革將是重點法案，此時更需要大家一起來思考如何抵抗這波年金改惡的風浪——蔡政府傾斜於資方需求所端出的年金政策，反映的正是政府百般配合資本家所造成不公平的惡質現象。要打破這樣的不公平，更需要由青年和勞動者們積極團結起來，共同討論及研商真正改革問題的方案，讓勞工老年生活得到真正保障、使年金財源得以真正永續。

## 二、勞基法

去年，民進黨政府為了砍掉七天假，謊稱「一例一休」可以填補砍假損失、並有效降低台灣過高的工時。未料，一例一休上路後，資方卻得寸進尺，指一例一休會增加過高的企業成本並且沒有工時上的彈性，將會導致「勞資雙輸」的局面。當初執意砍假、通過一例一休的民進黨也處處配合資方，即將在立法院下個會期拋出特休假的修正以及工時銀行的修法草案。

長期以來，台灣整體薪資成長呈現停滯甚至倒退的窘況——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去年受雇者的實質薪資為 46,422 元，低於 2000 年 46,605 元，薪資倒退了十六年；此外，薪資中位數長期以來低於平均薪資數值，去年中位數占平均數比率更下降至 83.24%，顯示勞工整體薪資愈趨往低薪集中。

換言之，不僅僅是基本工資調整，台灣整體受雇者的薪資也無法反映經濟成長——相反地，經濟成長的果實則被資方愈拿愈多。2015 年的數據顯示，受雇者報酬佔 GDP 的比率降至 43.97%，為歷年第三低；營業盈餘佔 GDP 的比率則升為 35.08%，創下近 11 年來的新高。

然而，自民進黨全面執政至今，並未看到蔡政府提出任何政策工具，來有效改善台灣的低薪問題。相反地，從去年民進黨強勢砍掉七天假、今年更打算繼續改惡勞基法、法務部針對今年長榮空服員集體請天災假將查有無「煽惑非法罷工」、勞動部裁決台鐵懲處春節曠職「不算打壓工會」，工會因此敗訴等，可以看到蔡政府這一年多來不僅惡化了勞工的勞動條件，更在打壓工會方面無所不用其極，削弱工會的談判能力，使得勞動權益獲得改善的可能不見任何一絲曙光。

### 三、兼任教師

全台的大專校院裏頭，目前有超過四萬六千名兼任教師，人數已與專任教師相當<sup>1</sup>。同時也面臨到高教商品化與勞動彈性化<sup>2</sup>的問題交纏，使得教師工作權與學生受教權一併受害。

首先，從**兼任教師的勞動處境**談起：

**一、兼任教師非學校編制內人員。**他們必須與專任教師一樣須負擔行政、學生輔導工作，卻同工不同酬。多數學校僅支付一節課 576 元鐘點費，更有 70 所私立大學過去 23 年來從未調漲鐘點費。

**二、工作處在隨意解聘的風險下，且沒有退休金。**學校可以在學期中隨意增聘、解聘兼任教師，僅因課程考量，一年當中僅有 9 個月有勞、健保，不具有投保勞工退休金資格（6%勞退金提撥），退休後生活困難。

**三、無法請病假、喪假、產假。**未如同專任教師有代課機制，如果臨時生病不舒服，必須另外自行尋找代課人員，等同於責任制一般的負擔課程，校方毫無責任。

在當前法規面上，因為無法適用《教師法》的保障，兼任教師與工會喊出「一體適用勞基法」以求最基本的勞動保障，但兼任教師卻兩度發生被切割適用的狀況。

**一、2016 年 9 月，勞動部終於預告兼任教師適用勞基法，卻在教育部和大學校方的壓力下，僅讓「不具本職」<sup>3</sup>的兼任教師適用。**

<sup>1</sup> 105 學年度大學老師人數，專任教師 46,897 人，而屬非典勞動的專案+兼任教師 46,834 人。教育部長期放任大專院校大量聘用政策上定義為「補充人力」的兼任教師，補充人力變成各大學教學主力。

<sup>2</sup> 從資本的角度來看，去除使用勞動的各種限制，或增加勞動的多樣使用，稱之為「勞動彈性化」。

<sup>3</sup> 教育部不讓在校外有本職的教師納入《勞基法》保障。

此切割適用，導致各校出現書面或口頭明示、暗示，要求各兼任教師自行找到某個在校外的本職證明，藉以排除教師適用勞基法，否則未來將不予續聘；或將不願配合自行「證明」具本職的教師，予以刪減授課時數到鐘點費幾乎不足以涵蓋教師前來上課的花費。



此種不當切割，很直接地在該學期造成各校打算解聘不具本職的教師。近期顯著的例子：

(1) 淡江大學今年 3 月曾預計不續聘 200 名兼任教師，校內抗議劇烈；(2) 世新大學在今年 9 月開始的學期，不續聘 50 位兼任教師，其中 46 名為不具本職。

二、在不當的切割政策造成爭議後，「一體適用勞基法」的民間呼聲始終沒有間斷。教育部和勞動部反而是政策大轉彎，決定所有兼任教師都不適用勞基法。教育部長潘文忠以「《勞基法》會影響學生受教權」為由，號稱兼任教師難以解聘的話，將無法回應學生多元的課程需求，而貪汙、性侵等不適任教師將造成校園安全問題。

教育部對既有現象視而不見，反而聲稱修改〈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就能保障教師權益。檢視該辦法中第四條第二項，卻是明文放任學校得基於「課程或師資調整」等理由，在學期中就將教師解聘。此辦法已在今年（2017）八月上路。

第一度切割適用，是扭曲事實，不會有一個人白天有工作，晚上去便利商店打工，晚上的兼職就不受勞基法保障。第二度切割適用，其不適用《勞基法》的理由，忽視了各行各業都可能面臨需要解雇員工的狀況，法條不會因為遇到兼任教師就不成立。

兼任教師不受勞基法保障、可任意解聘的處境，學校得用成本考量來經營，使得併班授課、大班化教學等狀況愈來愈嚴重，直接侵害到學生受教權。讓學生除了繳納高額學費卻選不到課的問題嚴重外，除了前述的世新、淡江，近日也傳出亞洲大學、健行科大打算任意刪減通識學分、裁撤兼任教師。任意解聘的問題顯然不只存在個別學校。

#### 四、境外生健保

我不能打工也沒有健保。

他們告訴我，學生只要乖乖唸書就好。

我不敢花錢也不敢生病。

他們告訴我，學生只要乖乖唸書就好。

我生病了。

我又生病了。

忘不了那種擔心與恐懼。

我們選擇抗爭。

他們問，你們從哪裡來？憑什麼？

2011 年大陸學生以「停留」方式來台，不符合健保「居留」滿 6 個月的規定，無法加入全民健保。2016 年 10 月蔡英文終於拍板決定允許陸生加入健保，但同時亦調漲所有境外生保費，要求全額自付。此舉非但沒有解決陸生的健康保障問題，還加重了全體境外生的經濟負擔。

年末，我們串聯起來，組織了「境外生權益小組」，訴求從不分本外的角度，挑戰社會福利涵蓋的邊界，同時從階級鬥爭的角度要求全民健保作為社會保險，必須回歸量能負擔的原則，阻止一場社會保險日益商品化的災難發生。

本環節將由境外生權益小組成員張郁將從陸生的角度，分享自身同樣身為境外生，卻無法加入全民健保的現狀及加入抗爭時忐忑的內心獨白。另一方面，黃康偉身為一位已經加入全民健保的外籍生，又為何加入這場看似「與我無關」的社會運動呢？這場境外生發起的社會運動又對台灣社會有著什麼樣的激盪呢？

## 第 3 章

### 資本主義壞在哪？

33

基進民主平等的理想以及所處世界的社會現實之間，有著遙遠的距離。民主平等主義者的理想，就是創造實現該理想所需的制度。將這個夢想轉變為實際抱負的第一步，就是找出我們身處的世界如何阻礙理想的實現。對於現實世界的這種診斷，提供了我們探索可能世界的經驗基礎。

本章將聚焦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如何違背基進民主平等主義的規範性理想。這不是說那些理想指出的缺陷都可追溯至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基進民主的平等主義是種全面性（encompassing）的道德信念，取得人類蓬勃發展所需物質及社會條件過程中，它不但挑戰在取得人類蓬勃發展所需之物質及社會條件的過程中，產生不平等的所有社會及文化實踐，也挑戰妨害人們平等獲得實現真正個人自由及集體賦權式民主之條件的所有限制，這包括了與性別、種族、族群、性取向、國籍、公民身分等相關的權力及特權結構。因此，展望真實烏托邦的想法，必須能闡述在以上各個面向上，穩健實現平等主義理想的制度安排。儘管如此，由於資本主義如此廣泛且有力地形塑了為人類蓬勃發展和民主賦權建立平等條件的前景，任何基進民主平等的社會轉型計畫，都必須處理資本主義之本質及轉型的前景。由於資



本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初已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經濟結構，因此這更是一個迫切的任務。這就是我們接著要談的內容。

### 定義資本主義：簡要的說明

34

資本主義是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特定方式。我們可以透過兩個基本面向來定義它，其一是**階級關係**（class relations）的性質，其二是**經濟協調**（economic coordination）的主要機制。

階級關係是一種社會關係，透過這種關係，生產工具被擁有，而權力也被運用在生產工具的使用上。在資本主義中，生產工具屬私人所有，生產工具的使用由該擁有者或其代理人所控制。生產工具本身無法生產任何東西；它的運作有賴於各種人類的勞力活動。在資本主義中，勞動由工人所提供；工人並未擁有生產工具，他們是為了賺取收入而受僱於資本家的工廠操作生產工具。因此，資本主義基本的階級關係就是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社會關係。<sup>1</sup>

資本主義的經濟協調主要是透過個人做為契約當事人，以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自願交換機制來達成——此即一般所稱的「自由市場」——生產出的商品及勞務的價格及數量，是透過自由市場而決定的。市場協調通常相對於威權式國家協調，後者運用國家的權力，根據不同的目的，對資源的分配下指令。<sup>2</sup>「看不見的手」這個著名的比喻傳達了市場的基本概念：僅在乎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與廠商，與其他個人及廠商進行協商以及自願交換，透過這種未經協調的微觀互動，形成一個在總體層次上

35

或多或少有協調效果的經濟體系。

資本主義的這兩大特色——由私有制及無產的工人所定義的階級關係，以及透過去中心化的市場交易組織而成的協調——結合起來，造就了資本主義廠商相互競逐利潤及資本積累的獨特動力。每個廠商為了生存下來，必須在與其他廠商的競爭中取得成功。廠商藉由創新、壓低其生產成本及增加其生產力，來勝過對方，增加自己的利潤，據此踩在其他廠商之上進行擴張。每個廠商都面臨此競爭壓力，因此普遍來說，為了生存下來，所有廠商都被迫追求某種創新。因此相較於以往任何經濟組織的形式，這種永無休止的逐利產生了資本主義驚人的動力體系。

當然，現實中的資本主義經濟要比上述所說複雜多了。經濟社會學家強調，只靠私有財產制及市場競爭的機制，資本主義的經濟仍無法有效運作，甚至無法存活；它仍需要其他許多制度安排，才能在現實中運作；而在所有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經濟下的社會組織中，也得到各種不同的制度安排。真實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制度特質，隨著時間及空間不同而有所差異。結果真實世界中的資本主義五花八門，與抽象的「純」資本主義不同。例如，有些資本主義中有個強力的政府，管制市場的各個面向，並以各種方式賦權（empower）工人，控制勞動過程中的某些面向。在這類資本主義經濟中，私有制的「私」已有部分遭到侵蝕，而市場中你情我願的交易也受到各種制度設計所限。在某些資本主義中，廠商與工人組織成各種集體結社，這些結社提供了一些有意義的協調形式，不同於市場及國家協調。商業結社、工會、商會以及其他類型的結社，有助於建立某些人口中的「組織性資本主



義」(organized capitalism)。其他的資本主義則缺乏這類穩健的集體結社形式，運作起來較接近自由市場模式。各式各樣的資本主義，都包括市場及國家管轄外、在其他場域內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尤其是家戶內及親屬網絡內，以及經常被冠以「社群」之名的、更大社會場域內進行的經濟活動。<sup>3</sup>

不管是對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人們，或是對該經濟體的動力來說，這些變異都很重要。我們將在第五章看到，這些變異有些可被視為是減少該經濟體內的「資本主義色彩」(capitalisticness)；有些資本主義社會確實比其他社會少了那麼點資本主義。<sup>4</sup>儘管如此，這些變形都還是資本主義，畢竟它們全都保留了兩項核心元素：生產工具屬於私人財產的制度，以及以市場做為主要的經濟協調機制。<sup>5</sup>

## 對資本主義的十一項批判

資本主義在大多數人眼中，顯然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環。公司的特定做法及政府的特定經濟政策或許是被人批判的對象，但資本主義本身卻不是人們會批判的目標。因此，社會主義者一直以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說服人們，資本主義會產生一系列不想要的後果，因此，我們至少應樂見這樣的想法，即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不僅可欲且可能。

針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批判，可歸結成以下十一項基本論

點：

1. 資本主義階級關係讓人類不必承受的苦難持續存在。
2. 資本主義阻礙了讓人類廣泛蓬勃發展的條件普及化。
3. 資本主義讓個人自由及自主性之中原本可以消除的缺點持續存在。
4. 資本主義違背了自由平等主義的社會正義原則 (liberal egalitarian 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5. 資本主義在某些重大的面向上沒有效率。
6. 資本主義整體上會偏向消費主義。
7. 資本主義會破壞環境。
8. 資本主義商品化威脅了廣被推崇的重要價值觀。
9. 資本主義在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中給軍事主義及帝國主義火上加油。
10. 資本主義侵蝕了社群。
11. 資本主義壓縮了民主。

以上這些批判，沒有任何一點可以三言兩語說清楚，每一點都有其爭議。它們全部都包括了某些負面效果的診斷，而這些效果被假設是由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所產生的——資本主義是帶有以下兩項特色的生產體系：由私有財產制及無產工人所定義的階級關係，以及由去中心化的市場交換組織起來的經濟協調。這些命題本身並未指出，假使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創造反資本主義的制度，可以消除多少負面效果。這些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傷害，而這樣的診斷可能是正確的，而且透過各種制度改變而非徹底取代資本主義，也很可能大大改善這些危害。頭痛可能來自壓力，但



造成的危害可藉由阿斯匹靈得到明顯改善。何種轉型才能治療這些危害，這個問題將在往後幾章的重點。在此，我們的目标是診斷這些危害本身，以及這些危害是透過什麼機制造成的。

另外兩點初步的評論是：第一，批判資本主義的人有時傾向將當代世界所有嚴重的問題及危害都歸咎於資本主義，例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戰爭、宗教基本教義派、恐同情結等等。我們應拒絕這種傾向。資本主義並非今日世界上所有罪惡的根源；還有其他的因果過程起作用，促成了種族主義、族裔國族主義、男性霸權、種族屠殺、戰爭及其他重大的壓迫形式。儘管如此，就那些不是資本主義本身導致的壓迫形式而言，資本主義仍可能涉入其中，使它們更棘手。例如，資本主義或許不是性別歧視的根源，但由於無法分配足夠的資源，無法提供高品質、政府出資的托育服務，使得社會更難克服性別歧視。因此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核心任務就是要具體指出何種資本主義的機制直接導致那些危害，並了解資本主義透過何種方式，間接阻礙了減少各類壓迫的努力。

第二，這十一項批判，有許多也可以用來批判二十世紀所謂的「社會主義」（或我在第五章所稱的「國家主義」〔statist〕）的經濟體制。例如，第六項命題批判資本主義會破壞環境，但我們也知道蘇聯國家主義經濟的威權式中央計畫體制，也不在乎對環境的危害。如果國家主義——生產工具由國家所有及控制，並透過集權化科層體系來協調——是替代資本主義唯一的可能方案，那麼就這些面向而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將失去其力道。我將在第五章說明，還有另一個替代方案，即扎根於「在實質意義

上以民主方式控制國家及經濟」這種概念的社會主義構想。<sup>6</sup>本書的主要論點就是，以此方式建構的經濟能提升我們的集體能力，減少十一項命題裡所提到的危害。

### 1. 資本主義階級關係讓人類不必承受的苦難持續存在

我要以一個簡單明瞭又沒有爭議的觀察開始：我們身處的世界有出色的生產力、富足，人類發展創意及自我實現的機會大大提升，但同時貧困不曾消失，人類潛力也一直遭到扼殺。這個觀察不但適用於這整體世界的概況，也適用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人們的生活處境。針對這樣的情況，有許多可能的解釋。或許，富足之中的貧窮就是生命苦痛事實的一部分：「窮人將常在我們身旁。」但也有可能只是暫時的情況，經濟進一步發展將消滅貧困：只要時間夠長，特別是在不受國家管制干擾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終將消滅貧窮。又或許，這些苦難及無法自我實現，只是個人犯了錯，讓自己的生活陷入窘境：當代資本主義製造了大量的機會，只是有些人因為太懶惰，沒有責任感，或是不願意把握機會，才讓機會白白流逝。但是，富足之中的貧窮也有可能只是社會經濟體制基本特質所帶來的現象。這就是社會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核心論點：**資本主義系統性地製造人類不必承受的苦難**——「不必要」在此意味著社會經濟關係經過適當的調整後，這些缺憾可消除。譴責資本主義壓迫及剝削最尖銳的反資本主義論述，即圍繞在這樣的命題上。

點出資本主義是當代社會貧窮的主要根源，這讓許多人感覺



奇怪，或許還會覺得荒謬。一直以來，「自由市場」以及逐利的企業家精神都被盛讚為技術進步、經濟成長、欣欣向榮的根源。這類論點繼續延伸，認為雖然社會問題及人類苦難的確存於富足社會之中，但這並不能歸咎於資本主義本身，而是要怪資本主義社會中與資本主義並存的其他社會過程。倘若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仍有 20% 的孩童身陷貧窮，那是源於他們破碎的家庭、貧窮社區的文化缺陷、缺乏深思熟慮而導致福利依賴與貧窮陷阱的公共政策，或是設計不良以致無法回應驟變的勞動力市場的教育體制。貧窮的持續完全無涉於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內涵。確實，自由市場會造成經濟不平等，但它也帶來經濟成長，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捍衛者很愛這麼說：「水漲船都會變高。」如果長期來看，窮人的命運終會得到改善，人們何需在意不平等？此外，所有代替資本主義的方案都導致更多問題。看看蘇聯等由國家控制的經濟造成什麼後果：資本主義最終勝出了，因為它有效率得多，也更能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更何況比起其他體制，資本主義往往更能促進個人自由以及政治民主。

確實，長遠來看，資本主義在過去兩個世紀帶動了科學與技術的長足進步，因此在地球上許多地方，有許多人營養獲得改善、疾病減少，同時平均壽命也增加。與我們的討論格外相關的是，這些改善不僅集中在少數特權階級或階層，而是在近期更廣泛地擴及並包含許多發展中國家。然而，資本主義並不是進步的唯一功臣——例如公共衛生的領域，國家採取的行動也和資本主義同樣吃重。這個事實——資本主義是部成長機器，成長能對許多人的生活水準帶來正向的影響——是資本主義成為穩固社會秩

序的原因之一。

第一項命題的宣稱，**不是**指資本主義從未以某些方式，將**以往**世界的苦難狀態降低，而是說相較於世界**可能的**發展，它讓原本可被消除的苦難來源持續存在。這當中帶著反事實的意涵：在今日的世界上，若實行合適的非資本主義制度，人類的苦難將明顯減少。光是引用各種經驗觀察，指出在現存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各種物質條件有改善，並不足以說這項反事實有誤。這一點是主張，改善的成就遠不及原來可能達到的幅度。

「資本主義的內在傾向是讓原本可被消除的苦難持續存在」這項主張背後的論點是什麼呢？在此有三項機制特別重要：剝削、技術改變導致社會無法控制的負面外部效果，以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競爭。

### 剝削

資本主義將經濟權力賦予特定一類人，即資本的擁有者，他們為了得到經濟利益，積極使許多人維持經濟依賴或不安定的情況。論證如下：

資本主義這個經濟體系，來自永無止境的追求利潤。這主要不是個別資本家貪婪的個人問題——雖然利潤極大化的文化，無疑強化了看起來很像是「貪婪」的唯利是圖。然而，它其實是資本主義競爭的動力，以及廠商一直有壓力要增加利潤或降低風險的結果。

資本主義廠商追求利潤的關鍵之一在於受僱者的勞動。資本主義廠商僱傭工人使用生產工具，以生產資本主義廠商所要出售



的商品及勞務。生產商品及勞務的總成本與販售價格之間的差異，就成為廠商的利潤。為了利潤極大化，廠商面臨勞動力的雙重問題：一方面，僱用勞動力要給薪水是種成本，資本家想要盡可能壓低這項成本（一如壓低所有生產成本）。在其他條件控制不變下，薪資愈低，利潤愈高。另一方面，資本家想要工人賣命，畢竟薪資水準固定，工人耗費的精力愈多，生產的東西也就愈多。在相同成本下，生產愈多利潤自然愈高。<sup>7</sup> 因此，資本家的經濟利益——他們賺得的利潤——端視他們能以多低的成本從工人身上榨取出多少勞動力。簡單來說，這就是「剝削」的含意。<sup>8</sup>

當然，個別資本家無法單方面決定薪資高低，也無法單方面決定工作的強度，因為這兩者同時受限於勞動市場的條件，也會面臨工人各種形式的抵抗。因此，為了利潤極大化，資本家希望讓勞動市場保持在一定狀況，不但確保勞動力的供給充沛，同時又削弱工人面臨增加勞動強度的反抗能力。資本家尤其希望見到大量的工人爭取工作機會，這樣一來往往能讓薪資下降，也希望失業率居高不下，以便讓工人害怕失去現有工作。換句話說，資本家很希望增加工人的脆弱無助。

### 技術改變

一直以來，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改變是資本主義競爭的趨勢，畢竟它是資本家維持利潤、增加生產力的關鍵方法之一。增加生產力本身是件好事，因為它意味著同樣的產出，不用再投入那麼多。這是資本主義的偉大成就之一，也是所有為資本主義組織經

濟活動辯護的人所強調的重點。

因此，問題出在哪？問題在於技術的改變持續讓既有技能遭淘汰，摧毀了工作，替代了工人，而這迫使人們面對很大的困境。但是，為資本主義辯護的人會說，技術的改變也會創造出新工作與新技能的需求，平均且長期來看，這將讓經濟體內的工作品質及薪資水準升級；據此，技術改變不但不會讓原本可被消除的貧窮深化，反而可能大大減少貧窮的現象。這項回應的問題在於，資本主義這個經濟體系本身並沒有一套機制，使那些技能過時且工作機會有限的人，得到那些需要新技能且逐漸擴張的工作。為那些失業工人提供新的技能及工作機會，可是一項大工程：這類工人很多都年紀偏大，資本主義廠商沒有太高意願，投資年長工人的人力資本；新的工作機會在地理上經常距離那些失業工人的住處很遠，而換到這樣的工作，對當事人來說，必須為脫離熟悉的社會環境付出巨大的成本；面對不具備適當技能的人，資本主義廠商經常不太願意提供有效的訓練，因為受好訓練的工人，可能會帶著他們的人力資本跳槽到別的廠商。因此，資本主義的技術改變，經常會產生需要新技能的高生產力工作，而比起被淘汰的工作，其中至少有部分工作能提供更好的薪資，但工作被淘汰及創造的過程持續製造出失業員工，許多人無法得到新的工作機會。除了新的機會，技術變革也造成勞動力邊緣化，而在**缺乏非資本主義之過程的制衡下**，邊緣化將導致貧窮。這樣的情況來自資本主義內在的邏輯，而在缺乏非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這種邊緣化將加深人類的苦難。



### 利潤極大化的競爭

技術改變是資本主義經濟龐大動力的——個特定例證：廠商之間為求利潤極大化而相互競爭將摧毀工作、並使工人失去工作。我們經常可以在全球資本主義與自由貿易中觀察到，資本主義廠商經常將它們的生產移到低薪資水準的經濟體，減少成本並增加利潤。這或許是因為地域間的薪資差異，無關技術改變或技術效能。在這種資本流動的過程裡，工作被摧毀，工人也被邊緣化。因為許多原因，資本遠比人的流動性更強：人生根於社群之中，移民要付出很高代價；跨越國境的流動往往受限於法律；即使在國境之內流動，失業工人也因缺乏所需的資源與資訊，難以移往有新工作的地點。如此一來，雖然資本主義的競爭與減少管制的資本市場刺激了經濟成長，卻也使工人失去工作，尤其是市場全球化之後。

綜合來說，剝削、技術改變的負面社會外部性，以及利潤極大化的競爭等三項過程，意味著資本主義雖是經濟成長的動力，它本身也製造脆弱性、貧窮、剝奪及邊緣化。當資本主義成為全球體系，這些過程就變得更為顯著。一方面，從一些例證中可以看到，資本的全球流動，加上資本主義的剝削、技術改變、利潤極大化競爭延伸到世界上相對未開發的地帶，有助於經濟快速成長及發展，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二十世紀末及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與印度。<sup>9</sup> 另一方面，上述這些過程也在世界各個角落，製造出嚴重且破壞力十足的邊緣化與貧窮現象。

原則上，成長果實的分配，能夠以改善每個人物質生活的方

使未來不再有更進一步的經濟成長，仍足以使那些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眾無需過貧窮的生活，甚至同時滿足第三世界貧窮國家裡每個人的基本需求。然而，不論是富國或全球，**資本主義本身**並不存在任何的機制，能藉由重分配實現上述的效果。水漲若果使**所有**船皆高，必須創造反資本主義的制度，以消除那些資本主義對許多人生活的毀滅性衝擊。正是因為資本主義創造了消除物質剝奪的潛能，但本身卻無法實現這種潛能，最終需承擔這個罪名：資本主義讓原本可消除的人類苦難持續存在。

### 2. 資本主義阻礙了讓人類廣泛蓬勃發展的條件普及化

當社會主義者（尤其是深受馬克思主義傳統影響的人）批判資本主義時，通常會提出它造成的一長串傷害：貧窮、枯萎的生命、非必要的折磨、機會的障礙、壓迫，或許還有異化及剝削這類帶理論複雜性的概念。然而，當描繪替代資本主義的願景時，浮現的不僅是沒有貧窮或物質被剝奪的消費天堂，而是一種人們在其中能發展蓬勃生活的社會秩序——能培養並充分運用他們的**天賦與創意潛能**。不再有物質剝奪及去除貧窮，當然是充分實現並運用人類潛能的基本條件，但對社會主義者而言，解放理想的核心是實現人類潛能本身，即我所謂廣義的「人類蓬勃發展」的意思：個人的天賦及潛能得到實現及運用。

針對資本主義的第二項批判指出，雖然資本主義或許明顯增加了人類蓬勃發展的潛能——特別因為它使人類生產力大有進展——並且雖然它確實創造了讓不少人能取得邁過蓬勃發展生活之



條件的環境，但是它卻阻礙這些條件擴展到全體人類的可能性，即使是在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中仍是如此，更別說世界上其餘地方了。特別值得關注的有三項議題：首先，就取得物質條件以過蓬勃發展生活的機會而言，資本主義創造了巨大的不平等；第二，就取得有趣且具挑戰性的工作機會而言，也存在著不平等；第三，高度競爭將摧毀蓬勃發展的可能性。

### 物質不平等及蓬勃發展

市場與不平等的關係錯綜複雜。一方面，市場與競爭對促進平等具一定效果：相較於早先的社會，資本主義市場創造了條件，容許一定程度的階級流動，而這意味著相較於以往的階級社會，如今在經濟不平等的體系裡，個人較不會因其出身而決定其位置。白手起家致富雖然相對少見，但是透過開放且競爭的市場，確實存在、也才得以成就這種故事。生氣蓬勃的市場經濟通常免不了被各種形式的非經濟的地位不平等所侵蝕，例如性別、種族、族群及宗教上的問題，但至少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使雇主有動機求取人才，而非以「先賦」(ascriptive)的特徵為用人的條件。資本主義有助於消除這類先賦條件的歧視，確實推進了使人類蓬勃發展的條件普及化。<sup>10</sup>

47

但是，市場也是帶動不平等的強力引擎。市場競爭製造贏家和輸家，因為輸贏的效果在個人生命中往往不斷累積，甚至影響下一代，倘若缺乏制衡的機制，市場不平等將隨時間而加強。這些不平等有些來自於個人稍能掌控的因素。尤其，當人們進行不同的投資時，會決定如何分配自己的時間及資源，包括投資以取

得人力資本(技能及知識)；因此，即使每個人在起跑點時被賦予同樣的人力及財政資源，經過一段時間後，不平等仍將浮現，反映出行動者不同偏好及努力。然而，許多市場產生的不平等只是機運使然，而非努力工作或個人眼光導致的結果。一名工人可能很負責任地將資源投資到教育訓練，但得到的結果只是一身過時的技能以及十分不樂觀的就業前景。即使這並不意味著身陷於絕對的貧窮，對於個人來說，卻是嚴重降低他運用天賦的能力。廠商倒閉及員工失業，可能不是由於缺乏規劃，或欠缺實務經驗，而是因為市場衝擊無人能控制。市場運作起來，並不是一套獎勵「才能」(merit)的健全機制，反倒比較像是殘酷的摸彩活動。

市場導致的巨大經濟不平等意味著，一旦缺乏制衡的非市場分配機制，用來實現蓬勃生命的物質工具，在國內各種人群之間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各個地區之間，將分配得十分不均衡。想當然爾，物質不平等將給小孩帶來特別嚴重的後果，大大限制他們取得發展自身潛能的條件。然而，這不僅是影響人類早年發展的問題而已。「蓬勃發展」的概念除了包括童年時期的知識、心理及社會能力，也涵蓋了人終身運用這些能力的機會，以及當生活環境改變時發展新能力的機會。資本主義市場對於一生的發展及運用自身天賦及能力這件事，在實際的機會上產生了巨大的不平等。

### 工作

除了勞動的經濟報酬之外，資本主義也造成人們在獲得有趣



及富挑戰性的工作機會上，有很大差異。資本主義下的雇主在規劃工作時，往往考慮如何盡可能以最低成本自工人身上榨取最多的勞力。這經常——雖不見得總是如此——是藉由技術引進來降低工作所需的技術門檻，把主要的任務變成一套例行工作，同時簡化工作所需的監控。技術變革確實能開啟新型態的高技能工人的需求，而其中有些工作也涉及不少解決問題的能力及運用創造力的機會。問題是資本主義下的廠商能提供多少這類具挑戰性的工作機會，不在於藉由該機會能從事有趣工作的人本身的需求，而是由這類工作機會能為廠商提供多少利潤來決定，而替受僱者創造有意義、有趣且具挑戰性的工作，很有可能無法帶來最大利潤。更有甚者，當新的技術條件衍生出有趣及有意義的工作時，如果該工作所需的技能很稀缺，因而薪水甚高，資本主義的競爭往往會持續產生壓力，將該工作相關的任務盡可能地簡化為固定程序，以降低花在僱用高技術人力的成本。<sup>11</sup> 因此，資本主義經濟底下，大多數人在主要的工作生涯中所擁有的工作機會，不大能讓他們發揮創造力及獲得挑戰，而這樣的情況阻礙了人類蓬勃發展的機會。

### 具毀滅性的競爭

競爭與人類蓬勃發展之間的關係也很複雜。一方面，競爭——即想辦法讓自己比別人強——是一種社會過程，驅使人們花許多時間、精力、資源以發展自己的天賦。這並不是說驅使人發展天賦的唯一動力，就是想要勝過他人；能夠掌握特定技能，並運用它們克服某些挑戰，達成目標或成就感也都是動力。然

而，競爭是一股強大的力量，為成功發展自身天賦提供報償，因此一定程度的競爭無疑會激勵人類追求蓬勃發展。另一方面，競爭也促成了一種成就文化，僅依照人們彼此的**相對**位置來給予評價。成就不是實現個人的潛能，而是比其他人好，贏得勝利。競爭演變到最極端的型態——Robert Frank 與 Philip Cook 稱之為「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 式競爭——最終僅有一位最優秀的贏家，拿走所有的獎賞；其他人全是輸家。<sup>12</sup> 這麼激烈的競爭對人類追求蓬勃發展，有著潛在的負面影響。最明顯的一點即是在激烈競爭的體制裡，個人一旦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已無勝出的機會，很容易變得灰心喪志並全盤放棄。更廣義來說，在這樣的激烈競爭體制下，大多數人都必須接受相對的「失敗」。因而產生的自尊及自信心喪失，也破壞蓬勃發展的心理條件。再者，在資本主義之中，資源配置增進天賦發展主要被視為經濟投資，而投資的成效則以預期的經濟回饋來衡量，培育天賦的資源往往會高度集中在可造之才。畢竟，在一個市場裡，把許多資源投資在平庸的人身上，是很不划算的投資，因此，資質平庸的人最終很可能愈來愈無法取得發展其天賦所需的工具。這也阻礙了人類普遍獲得蓬勃發展的目標。<sup>13</sup>

因此，競爭對於普及人類蓬勃發展的條件，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最終結果是正還是負，很可能取決於競爭的強度、以及其他有助於蓬勃發展的機制如何平衡競爭的後果。一個經濟體愈傾向以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組織——市場競爭及私有財產制能左右資源如何分配到不同事務——便愈不可能達成上述平衡。



### 3. 資本主義讓個人自由及自主性之原本可以消除的缺點持續存在

資本主義的捍衛者若談到資本主義最能將哪一個價值發揮到極致，那便是個人自由及自主性。Milton Friedman 曾論，深植於個人財產權的「選擇的自由」(freedom to choose)，是資本主義最核心的道德。<sup>14</sup> 資本主義產生了無數商店，裡頭擺滿五花八門的商品，只要荷包負擔得起，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要的東西。想投資的人可以自由選擇投資的地點。工人可以自由離職。市場上所有的交換行為都是自願的。個人選擇的自由看起來確實是資本主義運轉的核心。

這種立基於市場及財產制上的選擇自由雖不是幻象，但也不足以完整交待自由、自主性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資本主義為何阻礙而非充分實現上述理念，有以下兩大原因。第一，資本主義工作場所內的支配關係，對個人自主性及主導權 (self-direction) 構成了普遍的限制。私有財產制的核心就是所有者有權決定如何運用自己的財產。這給了資本主義中的廠商一個基礎，賦予他們指揮受僱者行動之權威。僱傭契約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受僱者同意聽命行事。<sup>15</sup> 當然，由於實際上老闆或許無法有效監督員工的每項行為，也由於在一些勞動過程中，老闆或許會授予員工不少自主性，員工在工作中可能仍享有一定程度的主導權。儘管如此，對大多數資本主義工作場所內的眾多工人而言，個人自由及主導權仍大幅受限。在工作的領域內失去自主性及自由，這一點即是批判資本主義人士所謂的「異化」(alienation)。

捍衛資本主義人士回應說，如果工人不喜歡聽命行事，他們有離職的自由。既然他們一直面對老闆的權威，都自願選擇順從，那我們就不應說他們是真的被支配。然而，個人可以自由離職逃脫支配不過是種幻象罷了，畢竟工人並不擁有生產工具，也無從取得生活基本必需品，他們必須在資本主義的工廠或國營組織內工作，他們不得不放棄自主性。

資本主義破壞個人自由及自主性理想的第二個途徑，來自於資本主義製造的財富及收入的巨大不平等。Philippe Van Parijs 極有說服力地指出，這種不平等隱含著「真正的自由」(real freedom) 在人與人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的不平等。「真正的自由」包括個人能有效地實現自我的人生計畫，能身處適切的位置實際做出對自己重要的決定。<sup>16</sup> 在這個意義上，財富及收入上的巨大不平等讓某些人能擁有更多的自由。雖然相較於以往的社會型態，資本主義確實增進了個人自由及自主性，但它也築起了高牆，阻礙上述價值的徹底實現。

### 4. 資本主義違背了自由平等主義的社會正義原則

自由平等主義對社會正義的理解圍繞在機會平等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的概念。<sup>17</sup> 基本上，這個概念意謂一個分配體系中，所有的不平等都是個人選擇與所謂「吉運」(option luck) 綜合的結果，如此該體系才是正義的。吉運就像是人們自由選擇的樂透——參與者事前就知道風險及成功的機率，然後決定要參與與賭注。如果贏了，就變有錢了；如果輸了，也沒什麼好抱怨



的。這與「凶運」(brute luck)恰成對比。在凶運中，人們無從控制自己面對的風險，因此對於結果也不需負道德責任。最常見的例子便是「基因樂透」(genetic lottery)，它決定了一個人擁有什麼樣的基因，而大多數的疾病及意外也具有類似的特質。對自由平等主義者而言，一個因為凶運導致其機會或幸福受損的人，理應獲得彌補，但如果是吉運導致的，則無需任何彌補。一旦針對凶運做出徹底的彌補，則每個人在實際上就有了相同的機會，仍存在的平等就是人們必須承擔道德責任的選擇所造成的結果。

資本主義在根本上與機會平等這種強力概念有所抵觸。財富的私人積累與資本主義在所得上的巨大差異，讓某些人擁有與生俱來的不公平優勢，孩子的例子尤其明顯。孩子成長的物質條件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這違反了機會平等原則，因為這讓某些孩子更容易取得人力資本，也讓某些年輕人更容易取得大量資本。因此，即使先不管如何彌補在基因樂透中受害於凶運的人，只要私有財富繼承制存在，只要父母擁有的資源完全左右孩子在人力資本上能獲得多少投資，機會平等都將淪為空想。由於資本主義必然導致這種孩子生活條件的不平等，它與機會平等有所抵觸。

18

資本主義不只違背了自由平等主義下的機會平等這種強力觀點，也違背了一般的自由主義的正義理想。自由的正義概念其中一項核心想法就是，在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時，若是對別人強加某些非經選擇的負擔，就是不正義。正因如此，竊盜被視為不正當，因為偷竊強加成本給受害者。資本主義中將私人利潤最大化

的邏輯，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廠商有一種內在傾向，試圖把成本轉嫁到其他人士上：在一些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如果某些生產成本由資本家以外的人來承擔——也就是說，如果非經選擇的負擔強加到他人身上——利潤就會提高。污染就是經典的例證：對資本主義廠商而言，直接把廢棄的商品傾倒在環境中，相較於為避免污染而花的成本，前者顯然要便宜許多。然而，該污染是以增加健康成本、環境處理成本、觀瞻惡化的形式，將成本強加到別人身上。這一類將成本轉移到別人身上的例子被稱作「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它們所展現的不只是沒有經濟效率而已——如同將在命題五討論的——也包括了不正義。

資本主義的捍衛者可以這麼回應，即如果我們能徹底具體定義且實行所有的財產權，將不會產生「負外部性」的問題。在一個徹底定義財產權、契約完備且資訊充足的世界裡，倘若有意資本主義廠商想把污染成本強加在我身上，那麼它必須先購買我的許可。如果我願意，我能出個價買出我呼吸乾淨空氣的個人權利。於是，資本主義廠商就必須決定，避免污染或是支付上述成本較為省錢。如果廠商決定污染空氣，這不過是承受污染者與廠商之間的自願交換。當一間大工廠將生產移往新地點，家的價值下降了；飛機製造出惱人的噪音等等；這樣的思路也可應用到所有其他類型的負外部性個案，全部都一體適用。

全面定義財產權歸屬並創造出這些權利能被交換的完整市場，基於幾個原因根本就不可行。創造出這種市場所需要的資訊條件不可能達成。即使差不多做得到，落實這些交換需要巨大的交易成本。更為根本的是，因為利潤極大化的行為造成的負外部



性強加到未來的世代，真正背負著非經選擇之負擔的人，無法參與到所謂的自願交換之中。利潤極大化的市場導致的資源消耗，由今日的資源使用者定出價格來支付這個成本，而那些將來得承擔成本的下一代，無法參與這個市場議價的過程。

當然，只要經濟體系內當前的生產與消費抉擇會產生出長期效果，都將面對負外部性強加到下一代的**世代間不正義**（intergenerational injustice）的議題。問題在於某些經濟體系的這個問題比較起來是否更嚴重。因為資本主義主張個人狹隘的自利，縮短投資得到回報的期限，並透過分散的市場來做經濟決定，上述負外部性的世代間不正義問題將更為嚴重。即使把經濟體系內的重大的投資交付民主控制，也無法確保下個世代的利益可以得到滿足，但至少在這樣的體系內，當前及未來利益之間的平衡，能被當成是重要議題來審慎考慮，而不只是自利的個人各自選擇所產生的結果。

## 5. 資本主義在某些重大的面向上沒有效率

如果自由與自主性的理想是資本主義在道德上的核心美德，效率就是它在實踐上的核心美德。姑且不論如何看待資本主義下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及不正義，至少人們認為它可以促進效率。它「創造出源源不絕的商品」。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藉由促進靜態效率（static efficiency）及動態效率（dynamic efficiency），牢牢地規訓著廠商。

靜態效率（有時稱為「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

是指配置資源生產不同東西的效率。資本主義透過市場供需這個標準機制來提高分配效率，市場透過競爭與分散的決策過程來決定價格。這樣的說法耳熟能詳：如果商品的供給低於需求，那麼價格就會升高，一般而言，也意味著該商品的製造商將創造更高的利潤（因為商品每單位成本不會等比例增加，而賣出商品的價格更高）。這種高出平均的獲利水準，將導致該商品短期供應增加，因此資源也將從獲利較低的活動轉移並重新配置。重新配置的情況將持續到該商品的需求得到滿足價格下降為止。

動態效率指的是增加長期效率的技術及組織創新。前面命題一的討論中已提及這一點：在其他資本主義廠商創新及降低成本威脅下，每家廠商都有創新的壓力，如此才能維持利潤。當然，把時間、資源、個人的能力花在創新有其風險，畢竟這種努力常常白費功夫。但是，抗拒創新也有風險，畢竟其他廠商在創新，長期下來，不創新的廠商的市場活力便會衰退。因此競爭的壓力往往會刺激創新，而由於相同的產出所需的投入愈來愈少，我們可以據此說競爭的壓力提高了效率。

這些確實是資本主義效率的來源。所以，相較於早期的經濟組織形式，或是由國家組織的集中威權式生產，資本主義似乎更有效率。然而，這並不是說資本主義本身就on不會造成沒有效率。判斷資本主義是增加或降低效率，一直是個不易回答的實證問題，我們的估計應該包括各種形式的效率及無效率，而不只考慮由狹義的市場數值計算出的效率。

資本主義中有六項特別重要的無效率的來源：公共財的低度生產（underproduction）、自然資源的定價過低、負外部性、監



督及執行市場契約、智慧財產權的變質，以及不平等的成本。

### 公共財

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捍衛者或批評者都普遍認同以下說法：資本主義顯然不利於公共財的生產。公共財指的是滿足以下兩條件的各種事物：首先，該事物生產出來後，很難阻止別人使用它；其次，某人對該物的消費並不減損另一個人的消費。最常用的例子便是乾淨的空氣以及國防。知識也是如此：某人對知識的消費，並不減少知識的存量，而且一旦知識被生產出來，你很難禁止人們消費它。由於無法輕易阻止別人消費你生產的東西，你很難獲取利潤，資本主義市場在提供公共財這件事上，做得並不好。因為許多公共財對生活品質以及經濟生產力來說都很重要，仰賴市場來生產公共財是沒有效率的。

乍看之下，能稱得上是公共財的東西似乎並不多。事實上，它的範圍很廣。思考公共財的一種方式是用「正外部性」來理解。正外部性是生產一項東西所附帶的正面效果。以大眾交通運輸為例，就有許多正外部性，包括節省能源、減少交通擁擠，以及降低污染等。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正向副效果，都可視為公共財，但它們都難以銷售：都市運輸公司無法因為降低人的健康成本，或因為大眾運輸減少空氣污染致使大家的房屋無須頻繁整修，而向大家索費。這些好處的受益者遠多過買票的人。如果大眾運輸公司以資本主義的邏輯運作，它在決定票價時考慮的是能打消生產該服務所花費的一切直接成本。如果該公司的服務所產生的正外部性可以支付給該公司，那麼每張票的價格將大大降低

(因為那些票價收入並不需要負擔運輸服務的所有成本)，但在市場內並無這樣的機制讓大眾運輸根據這些正外部性向人們索費。結果，每次搭乘的票價將比從整體效率觀點考量下應有的票價高出許多，而票價過高使民眾對大眾運輸的需求下降，因此該服務的供給也會較少，進而產出的正外部性也會減低。<sup>19</sup> 這就是經濟上的沒有效率。

關於正外部性的論點，同樣適用於教育、公共衛生服務、甚至像藝術及運動等事物。以上每件事都對整體社會有正外部性，效果超出直接消費該服務的人：生活在一個教育程度較高的社會要比生活在教育程度較低的社會好；生活在一個接種疫苗免費的社會較好，即使這個人本身並未接種疫苗；生活在一個充滿藝術活動的社會較好，即使這個人本身並未直接消費這些活動；生活在一個提供年輕人廣泛休閒活動的社會較好，即使這個人並非年輕人。如果以上的論點正確，那麼仰賴資本主義及市場來提供這些東西，在經濟上便是沒有效率。

### 自然資源的過低定價與過度消費

基本的經濟理論認為，競爭的市場裡，東西的價格密切反映生產的成本，且這被視為效率的展現，因為價格不斷向生產者及投資人傳達正確的訊號。如果某物的價格明顯高過生產它的成本，意味著該產品的投資人將賺到額外的利潤，而這向生產者傳達了增加產量的訊號；如果價格低於生產的成本，意味著投資人在賠錢，而這傳達了生產及投資都應減少的訊號。

藉由生產成本與供需互動能產生有效率的市場訊號，這個基



本論點用在汲取及處理非再生自然資源時，顯然就站不住腳。問題基本上出在人們考慮生產成本的投資回報期限較短，並據此解讀價格傳達之訊號。我們知道由於資源耗竭，未來化石燃料的生產成本將比今日高出許多。如果今日在計算獲利率時納入這些未來較高的生產成本，那麼我們就會明白，現今的價格並未反映出這些成本。據此，生產將減少，直到價格上升到足以反映未來較高的成本。然而，市場無法在現今生產的過程裡考量這些長期成本。結果，非再生自然資源的定價過低，因此導致過度使用。長期來看，人們正以沒有效率的方式在使用這些資源。

在某些例子裡，同樣的機制也影響著可再生自然資源。這種情況發生在只顧慮生產的短期成本，而使得剝削資源的速度快過資源再生的速度。經典的例證就是大量漁業資源的快速耗竭。海洋中的魚類當然是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前提是魚類被捕獲的速度不能超過魚類本身再生產的能力。然而，在現代科技的輔助下，捕魚的直接成本大幅降低，以至於市場上魚價過低，造成過度消費。因為生產者的成本在市場的投資回報期限太短，資本主義的市場本身無法解決這樣的問題。<sup>20</sup>這又一次導致了資源分配極度無效率。

### 59 負外部性

我們已依據自由主義對正義的界定討論了負外部性的問題。負外部性也是資源分配無效率的根源。資源在市場中能更有效率地分配，前提是生產者所經驗的金錢成本反映生產的真實成本，唯有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產品的需求量才能向生產者傳達正確

的訊號。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的廠商有很強的動機，盡可能把他們的成本轉移到其他人身上，畢竟這麼做能增加他們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前面說過，污染是經典例證：嚴格從利潤最大化的角度來看，如果資本主義的廠商可以任意棄置廢棄物卻不丟，那就是非理性。同樣的道理可應用到長期來看會影響廠內工人健康及安全的措施，採行這些措施往往得花大錢。除非不健康的條件將影響生產成本，不然以利潤最大化為考量的廠商，有充分的動機避免這些成本。

以上的考量並非僅是停留在理論思辨的層次。如今在討論污染控制、職業健康與安全時，廠商經常抱怨針對上述議題的規範使它們喪失競爭力，並進一步指出，位在開發中國家的廠商毋需遵守這些規範，因此在壓低生產成本的情況下能以較低的價格出售產品。事實上，這也指出未受規範的生產者可以把成本強加到他人身上。廠商抱怨得並沒錯，若不放鬆規範，它們很可能沒生意可做，但這同樣說明了在這些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迫使資源分配無效率。

資本主義本身無法解決此類問題；這些問題是私人逐利的經濟決策下無可避免的後果。當然，資本主義的社會面對負外部性並非無計可施。常見的做法如國家針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規範，藉此防止廠商把成本轉移到他人身上，以減少負外部性。然而，國家規範的機制總會侵蝕與資本主義相關的私有財產權利：其中有些權利將變成公共而非私人問題，例如決定多少廢棄物要傾倒在環境中。



### 監督並執行市場上訂定的契約及私有財產

資本主義沒有效率的第四項來源，來自執行市場契約所帶來的成本。市場交換的核心即契約——自願地同意交換各種財產權利。契約不會自己執行，因而就產生監督及執行協議的各種成本。愈多的資源用在這項工作，用來生產市場交易之商品及勞務的資源就愈少。若考量這些資源並非用在生產，而只是用來避免違約，我們可說這是沒有效率。

請律師及訴訟要花費大筆金錢，只為了處理如契約糾紛、民事訴訟、智慧財產權的保障以及挑戰政府對廠商的規範，足以顯示資本主義的財產權利導致效率不彰。由於爭議牽涉的利益，這些錢完全是理性行為，而且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免不了的開支。只是，這會使資源無法直接用在生產活動上。

然而，契約執行產生的效率問題不只涉及訴訟，還影響了契約關係的具體運作。以下兩個例子能說明這個問題的範圍有多大：勞動過程中僱用監督人員所耗費的相關成本，以及分散的私人醫療保險體系在文書作業上的成本。

僱用契約規定以一定薪資換取特定程度的工作量。問題是當工人正式同意執行這項勞動，他們不可能真的讓另一個人獲得消耗自己精力的控制權。由於人非機器，他們對自己的活動總想保留某種控制能力。一般來說，雇主希望工人盡可能賣命，這意味著雇主面臨如何確實從工人身上有效榨取他們的努力成果。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綜合了威脅不能怠工（特別是讓工人害怕被解僱）、提供良好的表現的誘因（尤其是升職規劃及調漲薪資），以

及監督工人的表現並實施懲罰。<sup>21</sup>

當然，所有需要合作的活動中，總有怠工的可能性。然而，由於勞動過程中的工人並非工廠老闆，資本主義的特定階級關係讓這個問題更加嚴重。例如我們在工人合作社中看到，如果工人擁有工廠，那麼他們個人的利益與上班工廠的利益，聯繫將更密切，而用在社會控制上的資源也將減少許多。<sup>22</sup> 既然工人擁有生產工具，他們普遍將更認真工作，所需的監控也更少，那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生產中密集的社會控制方式，是導致無效率的一大來源。

說明資本主義市場執行契約與效率問題的第二個例子就是醫療照護。美國的醫療照護是透過以下各種機制來支付：有些由政府負責，有些是個人依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付給醫生，有些則是依據資本主義利潤最大化原則，透過私人保險公司來支付。醫生、診所、醫院必須僱許多多人來處理保險相關表格，檢視病人的共同支付方式（co-payments）；保險公司必須僱人審查保險理賠案件，為想買保險者做風險評估；當然，病人也必須投入可觀的時間及精力，弄清楚一大堆複雜到讓人難以理解的帳單。加拿大的情況十分不同，所有的醫療帳單實際上都由政府透過名為「單一付費」（single-payer）的體系來支付。在醫生及醫療組織協商下，加拿大政府為各項服務訂定費用。醫生將所有的帳單都繳送到單一窗口以獲得費用的核退（reimbursement）。在執行私人保險契約這件事上，有一個指標可用來衡量效率流失有多大，即在兩個體系中與支付相關的文書作業及行政措施的花費，占總醫療成本的比例有多高。1999年，醫療照護的行政成本在美國



占了總醫療照護成本的 31%，但在加拿大僅占了 16.7%。總行政成本裡的所謂「管銷成本」(overhead costs)在美國幾乎占了私人保險公司在醫療照護花費的 12%，但僅占了加拿大體系中的 1.3%。<sup>23</sup> 雖然並非所有的行政成本都與契約有關，但加拿大的複雜特性有關。簡化資源配置及會計的加拿大體系，比起仰賴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美國體系要有效率得多。

### 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包括了用來防止人們無償使用各種知識及資訊的法律規定：專利限制人們對發明物的使用；著作權限制知識產品及藝術創作的複製；商標保護品牌名稱的使用。合理化這些私有財產權利形式的理由如下：若沒有它們，人們將失去發明物品、生產知識產品或創作藝術的動機。人們得花時間、精力、資源，投入研究與發展事業，最終才產生發明，過程中存在很高的風險。像書本及藝術作品這類知識產品也需要時間及努力，有時還得投入金錢。一旦這些產品最終有價值，除非事先投入的人有權利獲得該產品帶來的經濟收益，不然他們一開始就不會有動機投入。

當然，上述論點聽來很合理。然而，事實上卻少有經驗證據支持這個說法。<sup>24</sup> 這裡頭有三項重要問題。首先，雖然智慧財產權能確保動機，但也阻礙了資訊流通及新觀念的使用，這都讓進一步的發展受阻。專利及著作權對於發明、創意及知識生產的淨效果，端視以下兩股相對的力量孰強孰弱：動機的正向效果，以

及阻礙使用與流通的負向效果。我們沒有理由驟然認定前者必然大於後者。

第二，智慧財產權的捍衛者假定，誘發創意及發明的唯一可靠因素就是金錢報酬，但事實絕非如此。大學與其他研究機構中的公部門資助計畫，生產出許多研發成果。除了金錢以外，科學家還受到許多動機的激勵：名聲、好奇心、為了全人類福祉想解決問題。大多數的藝術家與作家（即使是最賣力的）都未從自己的作品得到大量金錢報酬，但他們因著對美學價值的執著及自我表達的需要而堅持下去。當然，金錢的回報並非無關輕重。如果智慧產品的生產者從他們的創意產品裡得不到金錢回報，他們或許無法繼續堅持下去。但對許多（或許是大多數）從事創意及知識活動的人來說，智慧財產權保護下的金錢，只是次要的誘因。

第三，對金錢誘因的強調及極力保護智慧財產權，實際上可能傷害誘發創意及發明的其他重要動機。不少經驗研究顯示，金錢誘因會損害有助於合作的利他動機，結果整體來看反倒減少合作機會，<sup>25</sup> 因此，也可能影響科學及藝術創意：希望藉創作在商業上獲利，而帶著強烈的金錢動機，會減低較講究無拘無束的藝術工作與科學研究的動機。

雖然有限度地保護智慧財產權，例如，確保作者歸屬的認定，對於引發動機來說的確有必要，持平來看，在充分展現資本主義色彩的情況下，嚴格保護智慧相關產品的私有財產制度，或許更束縛了發明與創意。如今在資訊科技中被稱為「開放原始碼」的運動（“open source” movement）就是以上論點的實際例證。最為人所周知的開放原始碼運動就是 Linux 電腦作業系統的發



展。Linux 的原始碼並無專利與著作權的問題。它是數千位程式工程師合作創造，並持續為它的發展貢獻新的編碼與想法。大體說來，這樣產生出來的作業系統，在技術層面上要優於它的主要對手，即微軟研發出的個人電腦作業系統。

### 不平等的成本

許多資本主義的捍衛者認為在平等與效率之間必須有所取捨，他們宣稱為促進平等所需要進行的重分配，將傷害努力工作及投資的誘因，因此最終降低了經濟效率。這個論點就像智慧財產權的說法，乍聽之下十分合理，但經驗研究迄今仍無法證明一個國家的不平等程度，與其經濟成長率、生產力的增長，或其他效率的總體指標有任何直接的關係。<sup>26</sup> 這就像智慧財產權的討論，問題在於有一些重要的理由，使不平等一旦跨過某個程度便會傷害效率，而產生的負面效果可能淹沒了與不平等相連的正向誘因效果。首先，高度不平等，尤其與底層的邊緣化相關時，往往會產生社會衝突及社會失序。警力、防衛措施、法院、監獄都是不平等的成本，更別提犯罪本身帶來的直接成本。第二，即使先不談社會失序的成本，高度不平等也會侵蝕社會連帶，即「我們同在一條船上」的感受。連帶對於有效合作非常重要——合作毋需仰賴龐大費用與監督，即可讓人努力並有責任感。第三，就效率而言，或許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高度不平等隱含人類天賦及資源的大量浪費。珍古德 (Steven Jay Gould) 這位知名的演化生物學者曾這麼說：「不知為何，相較於愛因斯坦大腦的重量及皺折，我對於擁有同樣天賦的人卻在棉田及血汗工廠裡

終老一生，這件蠻明確的事情更感興趣。」<sup>27</sup> 高度不平等必然意味著取得發展天賦及人類潛能所需的物質資源也不平等，這個浪費非常可觀。

以上各種經濟上沒有效率的問題，絕大多數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任何高度互賴、複雜的已開發經濟體，都會有潛在負外部性的問題，也都面臨過度利用自然資源的誘惑。任何形式的經濟組織，也都存在著怠工或其他機會主義的行為。如何結合物質誘因與內在動機以提升創意及發明，一直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因此，針對資本主義缺乏效率的根源進行批評，並不是要說這些根源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然而在資本主義市場運作中著重私人追求利潤的動機，同時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又充滿衝突，因此資本主義沒效率的情況會變得更嚴重，同時更難減緩。

## 6. 資本主義整體上會偏向消費主義<sup>28</sup>

資本主義的優點之一是它擁有一種關鍵動力，長期下來往往能增加生產力。生產力增加基本上會導致兩種情況：我們可以投入較少而生產相同數量的東西，或是我們可以投入同樣多但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這裡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是，它在整體上會偏向於讓生產力增加帶動更多消費，而非更多「休閒時光」。當然，有時改善人類生活狀態的最佳方式，就是增加產出。當經濟體產量不夠，人無法得到適當的營養、住宿及其他設備時，總產出增加的經濟成長確實是件好事。但當一個社會已經極度富有，我們便找不到什麼重大理由，可以說明總體消費的成長是所欲的。



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市場競爭動力，給資本主義經濟體施加龐大壓力，不迫使生產力提高，總產出也必須不斷成長。資本主義廠商必須出售商品與服務才能賺取利潤，賣得愈多賺得愈多。因此，資本主義廠商投入巨額資源，其中大多數顯然花在廣告及行銷策略上，也包括有系統地協助擴張產能的政府政策，不斷試圖增加產量及銷售量。總體看來，這創造一道很強的成長軌跡，偏向增加產能。由於整個文化形式強調消費增加將帶來個人的滿足，而這支撐起一個有動力、持續增加的消費型態，因此這種偏向可以被很貼切地稱為「消費主義」。

此種產出偏向藉由報出「成長率」這個標準方式無限上綱：人們以市場價格來評斷國民生產總額或國內生產總額的成長。在這種計算方式下，休閒時光被認為毫無價值（因為它無法在市場上出售），因此生產力提高而帶來更多休閒時光的經濟成長過程，反倒被視為是停滯，比較生產力程度相同的國家，若人民每週工作時數較短、有更長假期，將被認為是「較貧窮」的國家。

資本主義的捍衛者可能會如此回應對消費主義的批評：資本主義之所以刺激更多產出、而非更多休閒的主要原因，在於這就是人們想要的。消費主義僅僅是反映人渴望有更多東西的真實偏好罷了。左翼知識分子如此鄙視一般人的消費偏好，實在太傲慢了。如果人們真的希望休閒更甚於消費，他們就不必那麼辛勤工作了。

關於人們如何在休閒、工作與消費中抉擇，以上回應立基於三項錯誤的預設。第一，宣稱消費主義不過是反映出人真正想要的東西，預設人不受資本主義廠商的策略所影響，在完全自主的

情況下形成對消費及休閒的偏好。這樣的預設並不合理。文化訊息及社會上普遍的期待，深深形塑了人們對於需要擁有什麼才能活得舒服的感受。想像民眾消費的偏好都是在自主情況下形成，就好比在說廣告、行銷以及在大眾媒體推動消費主義的生活風格，對人們一點影響都沒有。

第二，「人們若真的想要，自然就不會那麼辛勤工作」這樣的宣稱，假定了沒有任何明顯的制度會阻撓人們自由選擇工作與休閒之間的生活平衡。這並非事實；除了個人對消費主義的偏好以外，還存在著明顯的阻礙，使人們無法在工作、消費與「休閒」之間的平衡自由選擇。許多資本主義廠商寧可僱用較少的工人，讓他們的工作時數增加，也不願用更多的人，讓他們工作時數短，畢竟在許多職業裡，每一個工人的聘用都有其固定管銷成本。其中有些是施行勞動契約相關規範所造成的結果，像是福利津貼及薪資稅，但另一些是隨著各種生產過程導致生產的固定管銷成本，包括正式訓練的成本、學習工作場所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的成本、在工作場所內建立社會資本的成本（也就是在勞動過程的參與者之間，發展人際網絡，建立順暢的溝通）。以上這些因素都意味著聘一個能工作四十個小時的人，比兩個各做二十個小時的人要便宜，而這使得雇主不願讓員工自行決定工作的時數（同樣的道理或許可換句話說，這讓雇主把減少工作時對他們造成的嚴重損害，以薪資及福利的方式進行補貼，這也使得工人在工作與休閒之間取捨時，得付出更大成本）。

第三，認為消費主義不過是種偏好（而非整體偏向）的說法，預設了如果很多人選擇不那麼消費主義的生活風格，將不會



產生顯著具毀滅性的總體經濟效果，以至於反消費主義本身變得難以持續。如果情況真的變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許多人能夠抵抗消費主義文化形塑的偏好，選擇更多休閒時間及較少消費的「自願簡樸」(voluntary simplicity)，因為市場需求顯著下降，許多資本主義廠商的利潤勢必消失殆盡。一旦市場不再擴張，某廠商所賺得的一塊、就意味著另一廠商失去了一塊，廠商間的競爭將變得更加劇烈，更廣泛來看，也會導致社會衝突加劇。因此，若反消費主義的各種運動能量夠大而顯著影響市場，資本主義經濟下的國家勢必會推動相關政策，以抑制這些運動。

發生經濟危機時，對於促進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消費傾向，國家的角色往往特別突出。政府會透過各種方式鼓勵人們消費以「刺激」經濟，例如減稅、降低利率以使借貸的成本更低，或是直接發更多錢讓人民花。例如 2008 年開始的那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學者就發出警語，提醒不但會因為失業率提高而使消費下降，人們還會開始存更多錢，而這會讓情況更糟。為了讓經濟重新上軌道，人們必須花更多錢，不要存那麼多錢。重振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一，就是重振大眾的消費主義。

當然，唯有持續不斷上升的消費帶來負面效果，這種偏向消費主義的情況才是個問題。這裡有四項議題格外重要：第一，如同隨後命題七將討論的，消費主義會破壞環境。第二，生產力高的社會中，人們生活裡仍覺得「時間很吃緊」，覺得時間不夠用一直是壓力的來源，但伴隨著消費主義而產生的這種文化壓力與制度性安排，讓人們難以單靠個人解決這些問題。第三，相較於沒那麼著迷於消費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式消費主義很可能較難

讓人們在生活中獲得意義及滿足。討論幸福感的研究明確指出，一旦人們達到舒適的生活水準，收入及消費的增加將不會提升生活滿意度及幸福感。<sup>29</sup> 人們較少透過奢華的消費找到意義及快樂，更常是透過與他人交往、從事有趣的工作及活動，以及參與社群。因此，消費主義做為過好日子的文化樣板，妨礙了人類蓬勃發展。最後，即使有人採取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好日子，而認為消費主義與不那麼消費主義的選項同樣都是種生活方式，這也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確實偏向消費主義，同時有系統地阻礙不那麼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問題恰恰就在於這種偏向，而不是消費主義本身。

## 7. 資本主義會破壞環境

資本主義顯然透過三種主要方式加重環境問題。每一種方式都已在上述各命題之中討論過了，但環境破壞的議題相當重要，值得我們在此重述。

第一，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面臨系統性的壓力，必須生產負外部性，這意味著在缺乏有力的對抗機制下，資本主義廠商將忽視環境成本。比起單單說這是個人出於自利而採取的理性行動，以上的論點要更進一步。個人會將瓶罐扔出車窗外而破壞環境，那是因為亂丟瓶罐不帶成本，且不在乎這項行為對他人造成的負面影響，而非個人感受到強大的壓力才這麼做。資本主義廠商面對降低成本的競爭壓力，將成本推給環境是降低成本的好策略。光靠市場本身無法制衡這種壓力，而必須仰賴國家或社會集



體力量進行非資本主義式的介入才可能達成。

第二，由於非再生自然資源對下一代的價值，並未納進當前供給需求的動態平衡之中進行考量，結果市場有系統地低估非再生自然資源的價格。這使得資本主義市場中的行動者過度消費這些資源。資本主義市場本身的投資回報期限考量較短，因此想要將這些資源對後代的價值納入當前決策的考量，同樣必須透過國家或社會集體力量來限制資本主義。

最後，資本主義市場的動力強烈偏向消費主義，這將產生嚴重的生態後果。原則上，生產力的提升非常有利於環境，畢竟要得到同樣產出，需要的投入變少了。然而，資本主義競爭將使市場逐漸擴張，消費的數量與日俱增，意味著一般來看，生產力的提升將轉化為資本主義下產量的增加及消費水準的提高。特別是當我們以全球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時會發現，如今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使得消費主義成為一個全球現象，我們很難想像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態如何能永續發展。這不是說貧窮國家的消費水準不應該提升，從任何一種社會正義的標準來看，這都是可欲的。但從全球的層次來看確實隱含一項事實：一個經濟體系不斷提升富國的消費主義，並阻礙任何抑制這些國家消費成長的長期計畫，這對環境確實是巨大的破壞。

## 8. 資本主義商品化威脅了廣被推崇的重要價值觀

「商品化」一詞指涉人類活動的新領域透過市場組織起來的過程。歷史上，這主要涉及由家戶的生產（商品及勞務為家庭成

員生產自用）變為資本主義廠商為了市場而生產；當代商品化也指由國家改為由資本主義市場來生產的轉變。<sup>30</sup> 家戶生產商品化的經典例證就是食物：過去大多數的人種植自己大部分的食物，自行處理供保存，然後自行料理食用。到了二十世紀，已開發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大多數人到市場購買所有的食材，但仍是帶回家中自行料理後食用。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民眾在市場上買到的食物愈來愈接近可食用的成品——冷凍批薩、微波食品等；而到餐廳吃上一頓完全商品化的餐點，成了已開發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大多數民眾食物消費的重要來源。

由市場組織事物的生產及分配，或許十分有經濟效率，但大多數的人覺得即使從技術、經濟的角度來看很有效率，有些人類活動仍不應該透過市場來組織。除了一些極端的放任自由主義者之外，事實上每個人都認為不應該透過資本主義市場的方式處理嬰孩生育及領養。<sup>31</sup> 即使這種市場上的交易全然兩相情願，把嬰孩變為商品，賦予他們市場價格，並賣給出最高價的人，這些舉措仍被大多數的人認為嚴重違背了人類的道德價值。大多數的人也反對自願為奴的市場——即在這樣的市場中，你可以將自己販售，自願地成為別人的奴隸。大多數人也反對大部分的身體器官市場，不論器官是來自活人（如腎臟或角膜這類東西）還是來自遺體（如心臟）。<sup>32</sup> 這有部分是因為人們認為以上的市場，終將鎖定無力抵抗的窮人，而導致許多失控的案例；也因為將人類身體化約到待價而沽的商品，讓人憂心。因此，即使在高度商品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人仍認為應該對允許資本主義市場來組織各種人類活動設下道德界線。人類不應該被當成商品來對待。



倘若商品化威脅重要的道德價值僅僅發生在少數特殊的個案，以這個觀點批判資本主義的力道將相對有限。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更細緻地檢視，我們會發現各式各樣的活動，商品化都可能引發顯著的道德爭議，以下是一些例證。

### 托育服務

托育是勞力密集的工作。有不少社會組織能從事這項服務：家庭、公營托育服務、各種社區托育，或是資本主義廠商所經營的市場導向營利托育機構。以市場來解決這項問題，並不表示所有營利型托育的服務品質必然糟透，傷害孩童的福祉，重點在於照顧品質通常取決於父母能付得起多少錢。提供托育服務的資本主義廠商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唯有在有助該目標達成的前提下才會盡力滿足孩童的需求。為了讓利潤極大化，聘僱托育中心的工作人員時（特別是服務貧窮家庭的中心），廠商有強烈動機尋求低成本勞動力。在大多數中心，托育員的訓練有限，托育員與小孩的比例低於理想值。資源豐富且有能力了解中心品質的父母，將能買到品質較好的托育，但許多家庭是沒有辦法的。

強力支持市場的捍衛者會認為，托育品質的高度特殊化並不是一個問題。畢竟，由市場提供的劣質托育，仍然比起完全無托育服務要好，而且無論如何，父母仍可選擇是否要自己待在家裡照顧小孩。<sup>33</sup> 他們選擇市場所提供的劣質托育服務，而不選擇家庭提供的優質育兒照顧，是因為整體來看能改善他們的處境。在這個過程中，若說有人輕忽了孩童的需要，那就是父母本身，因為對於要到市場上購買低水準托育服務以出外工作賺錢，還是不要

73

賺錢而待在家裡自行育兒，他們在兩者之間做了取捨。市場上的資本主義托育機構，只是反映出他們的偏好罷了。

這樣的辯解忽略了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性迫使人們必須做出上述取捨。其他提供托育服務的經濟體系，將創造其他類型的取捨——例如每個人都擁有高品質托育服務以及繳較少的稅——但這些體系將不會迫使貧窮父母必須在賺錢或低品質托育之間做選擇。不論人們覺得該為孩童需求不被重視負責的是消費者（父母）或是資本主義廠商，都無法改變以下事實，即托育服務由市場導向的營利組織來提供，將造成這種兩難後果。

當然，政府核發執照、品質控管並監督，能緩解托育品質的問題，但這些措施要有效果，必須介入市場的功能，限制私有財產權的運作，並藉此使服務供給過程不那麼資本主義。如果政府規範仍保有根本上資本主義生產的市場結構，那麼仍必然會導致服務成本提升，因索價過高而使貧窮家庭被排除在市場之外。除非引進其他非市場機制，例如政府補助壓低成本，讓服務提供不那麼商品化。重點在於，只要家庭無法提供的托育服務全然由資本主義市場提供，育兒商品化將很可能導致孩童需求不被重視。

### 產品安全

為市場提供產品的生產者必須要面對自己生產及販售給消費者的商品是否安全，這個議題在特定生產領域中格外顯著。一般而言，至少在需要更昂貴的設計或更嚴謹的品管下，改善產品的安全將使成本增加。因此，原本的問題會變成：競爭資本主義的市場中，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廠商面對安全改良帶來的成本與獲益



是如何抉擇？

針對這個議題，我們有很棒的經驗證據。最惡名昭彰的案例之一，就是1970年代福特平托（Ford Pinto）汽車油箱涉及的決策。Mark Dowie 根據福特公司內部備忘錄分析，簡單的事發經過如下：<sup>34</sup> 福特平托油箱在設計上有瑕疵，當遇上某些事故時容易爆炸。發現這個瑕疵時，公司必須決定在成本考量下，究竟是修正設計瑕疵，或是對這瑕疵導致傷亡引起的民事訴訟進行和解較划算。為了進行成本利益分析，福特汽車公司自行計算這類事故中每條喪生之生命的價值。它的計算主要根據因為死亡而損失的未來收入，在1971年時估計大約20萬美元。召回所有平托汽車並修復問題，每輛車要花大約11美元。根據數據，福特公司應該怎麼做呢？福特共出售1250萬輛同型車，每輛車需11美元，召回修復要花約1.37億美元。粗估每年因該瑕疵有180人喪生。因此，召回修復能讓福特汽車公司得到的總「收益」大約只有3600萬美元（180乘以20萬美元）。即使法院和解的費用高出預期許多，公司高層仍發現走法院訴訟並賠償罹難者，比起召回車輛修復要划算，因此他們最後並未修復這瑕疵。

如此計算在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資本主義市場上很有道理。唯一能「理性」找出成本利益取捨的方法，就是估算人命的「市場價值」。這麼一來，人命的虛擬商品化便讓廠商能從追求利潤極大化的策略角度衡量成本與利益。當然，在評估風險與分配資源時，總是需要計算成本與利益，畢竟我們無法面面俱道，而稀少的資源最終還是得分配。此處重點在於資本主義市場將這項問題化約為「對於資本主義的廠商來說，什麼最有利潤」，從而傷害

75

了人類的價值。

## 藝術

許多人認為藝術是探索生命、意義與美的重要人類活動領域。當然，各種類型的藝術家與表演家，經常都準備做出一定的個人經濟犧牲，認真投入藝術之中，而藝術活動很大一部分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的規範之外展開。然而，藝術仍然有賴財務資源才能蓬勃發展：戲劇表演需要戲院；交響樂需要演奏廳；所有的表演家與藝術家都得吃飯。如果這類資助的主要來源，是經由資本主義市場而來，那麼藝術的自主性及活力將備受威脅。許多劇場面臨巨大壓力，只能生產將創造「賣座」的戲劇，而不能生產具爭議性、創新或較難以理解的戲劇。音樂家因為「銷售量」的商業魔咒而有所窒礙。當出版商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策略，希望出版「熱門暢銷書」時，作家便覺得難以出版自己的小說。結果，一個全然商業化的藝術市場，將威脅人類藝術活動的核心價值。這是大多數國家的公部門都對藝術提供不少補助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也是為何有錢人要透過慈善事業來補助各種他們喜歡消費的藝術，例如歌劇、藝術博物館、交響樂。他們明白單靠賣給觀眾的門票收入，這些組織將無以為繼。

## 宗教與靈性

宗教與靈性（spirituality）處理了人們面臨的某些最深沈的議題：死亡、生命、目的、終極意義。所有宗教都認為上述議題超越了世俗世界的經濟活動；由於宗教能幫助人們面對這些事，人們認為它有價值。宗教獨特的價值也持續受到商品化的威脅。



許多虔誠基督徒譴責耶誕節的商業化就是著名的案例。但教會本身的商品化——把教會變成著眼於利潤極大化的宗教販售者——或許更深地威脅了宗教的價值。

這些例證無意暗示以市場準則與市場理性決定資源分配，永遠都不適當，只是要說對許多重要的經濟決定而言，市場邏輯需要與其他價值相平衡，而就某些資源分配來說，甚至應該盡量撇開市場準則。由於不同價值的異質性會在各種脈絡中起作用，可知平衡市場與其他價值是個複雜的工程。然而，當社會普遍認為商品化是解決經濟供給問題的最佳方式，當市場體現的特定成本利益之理性計算成為決策的普遍典範，我們無法對資源分配進行對話與審議，而這正是資本主義對我們的規訓。

## 9. 資本主義在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中給軍事主義及帝國主義火上加油

我所使用的軍事主義與帝國主義這兩個詞彙，指的是國家的性質及戰略。軍事主義指的是軍事力量的發展，超越狹義的防衛目標所需的程度。在一個高度軍事主義的國家，軍事人員、軍事情念及軍事價值觀散布在政府之內，使其政策都以軍事目的為優先。例如 1930 年代的日本以及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美國。美國的軍事優先宰了整個國家的預算，在政府與經濟的關係上，軍事支出扮演重要角色，軍事價值及觀點貫穿了外交政策。雖然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這種模式有增強的趨勢，但其實從 1950 年

代以來，這種模式一直都是美國政府的特色。帝國主義指的是一種國家策略，在國家的領土管轄範圍之外，藉由軍事及政治力量，達到經濟支配的目的。<sup>35</sup> 國家所使用的政治與軍事力量，包含了征服領土或推翻政權，但也包括了「較軟性」的權力形式，例如國際貸款及外交援助，這樣的交換能加深經濟上的依賴。這裡涉及的主要概念是，帝國主義乃一政治—經濟體系，在其中，國家權力被用在國際上，以支持全球經濟剝削及支配的模式。

帝國主義與軍事主義顯然相互關聯，畢竟軍事力量是用來拓展及防衛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模式的一種主要權力形式。儘管如此，區分兩者也是有用的，因為軍事主義並不只是服務於經濟目的而已，同時也受到地緣政治動力的形塑，<sup>36</sup> 而經濟帝國主義並不僅仰賴軍事力量。

在這種定義下，軍事主義與帝國主義，很難說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封建國家主要也是圍繞在軍事力量、及立基於軍事控制的臣服形式而組織起來；自從最早的城邦國家形成以來，為了剝削人力及自然資源，不斷發生對領土的專斷支配。因此，資本主義並未創造軍事主義及帝國主義。儘管如此，資本主義確實以特定方式給軍事主義及帝國主義火上加油，在當代世界形塑了兩者的不同特質。

資本主義自出現以來就一直伴隨著帝國主義。尋找市場及利潤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這經常意味著把市場擴展到新天地，並在世界各地尋找利潤的來源。有時是透過純經濟手段來達成這種全球市場開發及資本主義擴張；商人擴展自己的商業網絡，找尋遠方供應特定商品的新來源，或是投資能獲利的據點。然而，



這種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時常有軍事力量做為後盾。

歷史上，有許多不同的力量，讓軍事力量連結經濟擴張。使用軍事力量來擴張與捍衛市場，可以把敵對的資本主義階級排除在那些市場之外。這在重商主義及殖民主義時代尤其重要，那時大資本主義貿易公司與國家關係緊密，後者讓前者以壟斷方式維持貿易活動。軍事力量也可用來消除抵抗資本主義的力量，例如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發動戰爭。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軍事力量扮演重要角色，透過軍事的直接干預以及各種形式的間接介入，鎮壓了世界各地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及政策，使全球資本積累成為可能。<sup>37</sup>

因為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連結，使得資本主義為軍事主義火上加油。此外，由於軍事支出對經濟的重要性，在這層意義上，軍事主義與資本主義緊密相關。這在美國尤其關鍵，其軍事支出對資本主義經濟非常重要，左右了許多大公司的獲利，但即使在瑞典這類不那麼軍事化的國家，軍事硬體設備的生產仍是資本主義生產中利潤很高的部門。「軍事支出對資本主義廠商有直接利益，而這解釋了軍事主義的出現」，這樣的說法有些誇大，但軍事支出對經濟的重要性確實創造了一群為數可觀且力量強大的民意，反對去軍事化。

## 10. 資本主義侵蝕了社群

「社群」(community) 是社會及政治討論中多變的詞彙之一，常根據不同目的而指涉各種現象。在此，我較廣泛地將它界

定為一社會單位，在其中人們關心其他人的福祉，同時感覺與他人之間存有連帶及責任。「社群」未必要像社區一樣是個小規模的地理區域，但通常也根植在地域之上，因為人們經常透過面對面的直接互動，而建立這類深層依附與許諾。由於互惠、連帶、相互關切及照顧，有強度及持續時間長短的差別，人們也可以討論社群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的**程度**(degree)。強社群裡彼此有深厚的責任，而弱社群裡責任的要求有限，並且較容易失落。

社群做為一種道德理想，指的是這種連帶、互惠、相互關切及互相照顧的價值。擁有這種社群是人類蓬勃發展之社會條件的一個面向。然而，社群不只是在道德上定義好社會的問題；它也是一個工具性(instrumental)提問，對長久存在於人類實務中的深層難題，探索什麼是最佳解答：我們唯有彼此合作，才能存活甚至興盛。合作可以建立在全然自利的基礎上，但這種合作比起出於互惠、責任及連帶的合作要脆弱，且需要更多監控及約束力。因此，即使我們不特別重視做為一種道德理念的相互關切及互相照顧，仍然必須承認社群對於降低社會合作的成本，有其工具性價值。<sup>38</sup>

資本主義做為組織經濟活動的體系，與組織社會合作的社群之間，存在著很矛盾的關係。一方面，資本主義預設至少存在較弱的社群，畢竟市場交易與契約之所以可能，某個程度的相互責任很重要，這就是涂爾幹所謂的「契約的非契約性基礎」。<sup>39</sup> Polanyi 強調如果市場未有效被社群的制度限制，市場將摧毀社會。<sup>40</sup>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會破壞社群。在此有兩點特別重要：首先是市場如何促成反社群的動力，第二是資本主義如何產生侵



就社會連帶的不平等。

資本主義市場主要的內生動力與社群原則相互衝突。G. A. Cohen 在〈回到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Back to Socialist Basics) 一文中精采地解釋這種衝擊：

在此，我所謂的「社群」指的是反市場原則。據此，我服務你，不是因為我這麼做可以得到什麼，而是因為你需要這項服務。這是反市場的，因為市場驅動人們做出貢獻，是建立在非人際的現金回報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人類相互許諾的責任，以及被他人服務時想要回報他們的願望之上。在市場社會中，生產活動的立即(immediate)動機通常混合了貪婪與恐懼……透過貪婪，其他人被視為可能致富的來源，透過恐懼，他們則被視為威脅。無論由於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我們已多麼習慣及適應這種觀點，這樣看待他人的方式還是很可怕。<sup>41</sup>

市場培養了人們的特定傾向，這些傾向與發展一個好的社群所需的動力恰恰相違背。當然，社群與市場並非無法共存；社會學沒有任何一條規律斷言，在與社群深刻矛盾的規則運作之下，社群就無法生存。然而這告訴我們，資本主義中重要社會互動的廣大領域，受到反社群動機的支配，如果想強化社群，人們必須對抗無所不在的市場情況及市場思維。因此，社群的範圍往往被限縮在個人關係及地方環境的層次，無法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互動領域。

特別是由於資本主義階級關係內的剝削機制，資本主義導致

經濟不平等的情況破壞了社群。剝削關係中，剝削他人的群體為了積極維護自己剝削來的利益，希望維持被剝削群體的脆弱情況及被剝奪的條件，這導致了利益衝突，進而破壞了彼此同舟共濟及相互扶助的傾向。

馬克思認為，由於被剝削階級內部連帶增強，將緩和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社會連帶破碎的趨勢。他相信資本主義的動力，將強化廣大工人群體的互賴及同質性，而這種互賴與同質性將增加連帶感。於是，工人社群將轉變資本主義，最終成為全人類共組大社群的基礎。不幸的是，資本主義的動力並未讓階級處境徹底同質化，反而造成複雜的經濟不平等，強化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資本主義不但未讓資本家以外的一般大眾形成廣泛連帶，反而導致人們在市場不平等及區隔的機會條件下，形成各個內部共享利基連帶的小群體。於是，在貪婪及恐懼等驅動競爭的內在力量作用下，在競爭導致的不平等結構下，社群變得狹窄且支離破碎。

## 11. 資本主義限縮了民主

資本主義的捍衛者經常認為，資本主義是促成民主的基本要件。這項命題最著名的說法源自 Milton Friedman 那本號稱是資本主義宣言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sup>42</sup> Friedman 認為，資本主義的一大優點便是透過在制度上區分國家權力與經濟權力，避免權力的單一集中現象。因此，資本主義促成菁英間彼此競爭的社會秩序，也導致個人自由與民主政治競爭。確實，資本主義無法保證民主；例如我們看到許多威權政府



統治資本主義社會。因此，資本主義是民主的一項必要（雖非充分）條件。Friedman 認為，它是一項關鍵的必要條件，一旦配合（也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經濟發展，最終幾乎一定能產生民主。

即使拒絕接受 Friedman 的論證中較強烈的說法——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民主——但無可否認的是，高度經濟發展下的資本主義與民主政府有很強的關聯。Adam Przeworski 曾揭示，（至今）一個平均收入約高於六千美元（1985 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單位）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任何民主政府曾轉變為獨裁政權。<sup>42</sup> 儘管如此，如果我們認真看待「民主即民治」的理念，便會發現資本主義以三種重要的方式限制了民主。

第一，按照定義，生產工具「私」有制意味著，能夠產生廣泛集體影響的主要領域，從集體決策過程中被移除了。雖然人們偶爾會爭議私有財產權控制範圍與公權力控制範圍之間的界線，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般認為運用財產的決定是私人事務，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公權力才有正當理由干涉。

如果資本主義廠商擁有者做的私人決定，不會顯著影響未參與該決定的人們之福祉，那麼民主將不會受到太大限制。民主的概念指的是人民應該共同決定影響他們集體命運的事務，而不是指社會上所有資源的使用，都應該經由集體民主過程來決定。因此，關鍵的議題就變成，資本主義廠商擁有者所做的私人決定，通常對他們的員工以及未直接受僱於該廠商的人們，造成巨大的集體後果，因此將公眾審議及控制摒除在決策之外，會傷害民主。一個社會裡的工人若能在工廠內擁有具實質意義的民主控制

方式，比缺乏這種制度設計的社會要更民主。當然，資本主義的捍衛者會說，考量經濟效率問題，或認為人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願處置「他們的」財產，即使結果對他人產生巨大的影響，都是將非所有權人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的理由，但是這些考量無法改變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減損民主的事實。<sup>43</sup>

第二，不讓民主團體控制投資分配，除了直接造成傷害民主的效果，針對這些資本主義廠商本身間接涉及的活動，民主團體無力控制資本流動與運作，也會傷害民主設定集體優先順序的能力。例如，地方稅的來源有賴私人投資，投資的數量則掌握在私人手裡，因此削弱社群對提供公共教育、托育、治安、消防等服務的最佳方式做決定的能力。資本主義限制了民主集體提出以下問題的權力：面對不同的優先順序選項——經濟成長、個人消費、公共設施、公立托育、藝術、治安等——我們如何配置**總體社會剩餘**（aggregate social surplus）。這裡涉及的問題，不只是許多這類決定都並非經由民主審議的方式來做出，而是因為投資是私人決策，不投資的威脅大大限縮了民主團體對所有資源配置的決定權，即使這些決定與資本家的投資項目無關。<sup>44</sup>

第三，資本主義動力產生的財富與經濟力量的高度集中，顛覆了民主政治的平等原則。政治平等意指當人們試圖有效參與民主政治及影響政治決定時，諸如種族、性別、宗教、財富、收入等與道德無關的特質，不會造成他們的機會不平等。這並不是說每個人對於政治結果的影響力實際上都是一樣。看起來值得信任、誠實、能夠清楚且有說服力地表達理念的人，相對於較缺乏這些特質的人，事實上能對政治過程發揮更大影響力。然而，這些是



與公眾真思集體決定相關的道德特質。政治平等的關鍵是，無關道德的特質不應造成政治權力不平等。資本主義違背了這項條件。雖然美國相較於其他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違反政治平等原則的情況更加嚴重，但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有錢人及在經濟體中占據有力位置者無疑擁有更大影響力，能左右政治結果。這裡頭有許多機制在發揮作用。有錢人可以資助政治競選活動。公司掌權者擁有社會網絡，讓他們能接觸到政府決策者，他們更能夠資助遊說人士，去說服政治人物及政府官員。他們對媒體也有更大影響力，特別是對私人擁有的資本主義媒體，藉此也影響民意。雖然選舉中一人一票是維繫政治平等的重要方式，然而它確保資本主義民主的廣義政治平等的效力，卻因為資本主義中政治與經濟權力的盤根錯節，而破壞維持民主的有效能力。

\* \* \*

從基進民主、平等主義、規範的觀點來看，這十一項命題點出資本主義問題所在。如果有人能說明資本主義可藉由本身的機制及時修正命題所談到的傷害，在此意義下證明這些命題有誤，那麼闡述替代資本主義之解放方案的動力將大為下降。然而，根據當前對資本主義固有特質及動力的理解，這種自我修正的可能性相當小。如果以上判斷無誤，那麼任何想改善命題所談傷害的嚴正努力，最後都必須對抗資本主義本身。

這馬上帶出兩個嚴肅的問題。第一，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是什麼？除非我們相信可行的替代方案確實可能減低這些傷害，否

則挑戰資本主義的舉動又有何意義？第二，我們如何能挑戰現存社會上的權力關係及制度，以實現這個替代方案呢？如何從此岸走到彼岸？接下來，本書將試圖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 註釋

1. 將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視為只有兩種階級位置——工人與資本家，是高度簡化且抽離現實的。雖然這確實是資本主義中核心或基本的階級關係，真實的資本主義社會包含了許多其他種類的階級位置，特別是寬鬆地包含在「中產階級」類別之下的人，無法貼切地被歸於這種兩極階級關係，結合到真實且如何把這種簡單、抽離式的工人—資本家的兩極化階級關係，結合到真實且複雜的階級結構，請參考以下著作中的討論：Erik Olin Wright, *Class Cou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 1。若想了解更多理解階級的取徑，請見 Erik Olin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在國家及市場之外，仍有其他經濟協調機制。許多經濟社會學家主張，協調也能透過結社、社群，以及各種包括親屬網絡在內的社會網絡達成。若想更了解協調的多樣過程之議題，請參考 Wolfgang Streeck, "Community, Market, State and Associations? The Prospective Contribution of Interest Governance to Social Order," in Wolfgang Streeck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eds), *Private Interest Government: Beyond Market and State*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Sage, 1985), pp.1-29。
3. 家戶經濟活動包括各種被稱為「家務工作」(housework)的活動。社群經濟活動則包括範圍很廣的非正式工作，例如朋友間互相幫忙照顧嬰幼兒，或是透過教會的安排從事志願性服務。這些工作都是提供商品及勞務以滿足人類需求的勞力活動，就這個意義上來說，都算與「經濟」相關。欲見更多關於這類「非商品化」形式的經濟活動，請見 J. K. Gibson-Graham,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chapter 3。
4. 資本主義經濟的變異，在理論層次上可區分為兩種獨特的形式：(1) 類型 (Types) 的變異；這類變異包括以下面向的差異：市場的競爭性、廠商的規



模、技術發展的程度、不同工業部門所占的比率，以及勞動過程中如何分工等。(2) 混合 (Hybrids) 的變異：這類的變異，來自資本主義及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以各種不同方式結合或相互穿插。其變異展現在國家直接組織生產的程度、家戶生產的重要性、合作社及其他種類的集體共有形式的角色，以及前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持續存在的程度等。在理解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上，第二類變異尤其重要。我們將在第五章花更多篇幅討論混合的議題。

5. 我們在此將迴避一個複雜難解的理論性問題：面對一個結合了資本主義元素以及其他種類的非資本主義元素的經濟體系，你有什么理由仍視其為整體而稱之為「資本主義」？一個經濟體要有多少非資本主義的成分在其中，你才會給這個混合一個全新的名稱，而不再稱它為某種資本主義的混合？面對這樣的提問，顯然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例如，有人會說只要資本主義的元素仍占「最重要的地位」或「具支配性」，那這個體系就仍是資本主義。有人或許會說，只要社會再生產及發展的動力，「主要」還是資本主義的，那麼這個社會體系就仍是資本主義。這些說法雖然聽來蠻有道理，不過還是有些含糊其詞，畢竟它們使用的字眼，如「比較」、「具支配性」、「主要」都無法以明確的數量來定義。

6. 就破壞環境這個面向而言，資本主義及國家主義都有著類似的缺陷：無法讓公眾廣泛地就以下議題之間的利害交換進行思辨：眼前的消費、經濟成長，以及環境保護；同時也看不到能將以上的公眾思辨結果轉化為有效公共政策的民主機制。而且，這樣的缺陷在威權式國家主義經濟中可能更嚴重，畢竟不論是政府或經濟體都不受民主控制。在有民主政府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即使民主相對淪為表面形式，仍存在較大的公共空間，得以讓人民就環境議題進行思辨，並且容納對於經濟體系破壞環境的作法施加某些限制的政治過程。

7. 這兩項目標——付給工人的錢愈少愈好，又要他們愈認真工作愈好——之間存在著一些張力，畢竟工人得到的薪資會對他們努力工作的程度造成影響。原因有二：薪資較好的工人較容易對其雇主產生責任感，而薪資愈好的工人愈想要保住自己的工作機會，不希望被解僱，因此工作起來格外賣力。雖然未在其分析中明確使用剝削這個詞彙，但一篇關於工作動機之性質的論文精采地處理了以上幾個議題：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18 (1990), pp. 165-222。

8. 當剝削一詞用在資本主義分析中時，引發了不少爭論。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資本主義的剝削唯有在以下情況才會發生：市場關係中存在著某種強制形式，迫使工人以少於其勞動力在競爭市場裡的價格出售勞動力。有些社會學家（例如 Aage B. Sørensen, "Toward a Sounder Basis for Class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6 [2000], pp. 1523-58）使用了與上述新古典

經濟學概念有些出入的定義，認為剝削是與各種「社會壁壘」(social closure) 相關的尋租 (rent)。針對剝削界定的議題，可進一步參考 Wright, *Class Counts*, chapter 1, and G. A. Cohe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Concept of Exploitation," in G. A. Cohen,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事實上，馬克思見資本主義擴張到世界最遠的角落，並且認為這是較未開發地區要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帝國主義是產生一個真正全球資本主義的必要過程，對馬克思來說，這也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請見 Bill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0)。

10. 馬克思及韋伯 (Max Weber) 都注意到了資本主義對這種「先賦」地位不平等的影響——與出身特質相關的平等——這也是資本主義的優點之一。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中看到了傳統的地位形式在資本主義的衝擊下都「煙消雲散」(melting into air) 了，而韋伯則是見證了資本主義市場摧毀僵固的社會秩序的動力。關於馬克思與韋伯在這一點上的相似之處，請參考 Erik Olin Wright, "The Shadow of Exploitation in Weber's Class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6 (2002), pp. 832-53。

11. 因此，在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循環的過程：技術改變常能創造對高科技工人的需求，讓他們從事新類型的工作；往後的創新則朝向簡化這些工作為固定程序的方向前進，讓對高科技工人的需求不再必要。電腦程式設計師這項工作的演變軌跡，恰能貼切說明此過程。在 1960 年代，這是一項技能要求極高的工作，從業人士需要受過很長時間的教育。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隨著電腦的重要性大大增加，程式設計的任務已被簡化為固定程序的作業，相對而言不需要過去那麼多的訓練即可完成。

12. Robert H. Frank and Philip J. C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Why the Few at the Top Get So Much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Penguin, 1996)。

13. 在贏者全拿的市場中，人們往往因為對可能的報酬懷抱著不切實際的期待，而容易過度投資發展特定種類的天賦。例如那些居住在城內貧窮地區的男孩，尤其常見投資過多時間、精力於發展運動能力的情况。Frank 和 Cook 的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一書中有過度投資於運動的討論。

14.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New York: Harcourt, 1980), and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5. Robert A. Dahl 在那本論民主之意義的重要作品中說，我們沒有什麼合理的理由認為，私有財產權能賦予控制受僱者的獨裁權力。就像雖然在某些案例中，人們可能自願在契約關係中成為奴隸，但我們仍廢除了奴隸制，我們也可以通過法令，禁止人們在與資本主義廠商的受僱契約關係裡，放棄他們的自主權利。見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and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16 Philip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Van Parijs 強調了收入分配如何產生真正自由中的不平等。讀者若更想深入了解普遍的財富不平等如何減損了大多數人的自由，請參考 Bruce Ackerman and Anne Alstott,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7 針對正義這個概念，自由平等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都強調個人選擇與自由權很重要，但他們對以下這件事的標準有所歧異，即什麼樣的情況才可謂個人選擇能產生正義結果。
- 18 這裡的論點不只是說，因為現存的各種資本主義無法改善機會不平等的情況，所以它們是不完美的。該論點主張，它們若想在根本上充分彌補上述不平等，它們將不再是資本主義。這意味著誠實的資本主義捍衛者必須承認：資本主義必然違反有意義的機會平等，而因此它根本上就是不正義的，但從其他面向來說，它仍是可欲的，且其他面向是如此出色，以至於持平而論，資本主義仍是值得支持的。
- 19 這些大眾交通運輸帶來的正外部性只是證成應透過公領域補助大眾運輸體系的其中一項理由，但一般而言，這些補助仍相對有限，運輸體系被認為必須透過使用者付費的方式，來負擔生產服務時絕大多數的營運成本。這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是不理性的。事情很可能變成如下所述的情況：如果大眾運輸產生的正外部性都納入考慮（包括對未來世代的正外部性），那麼對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乘客提供全額補助，才是該服務最有效率的計費方式。
- 20 當然，漁業資源耗竭的問題並非無解，而是解決方法必須違背市場法則及資本主義競爭，只是這也未必是徹底放棄市場的過程。例如，當定下了捕魚總額，仍有各個不同的資本主義廠商相互競爭各自可獲得的配額。總額的訂定是透過非市場、非資本主義的機制來達成——通常是由政府以官方權威下達——但在總額內個別權利的分配，可以透過市場來進行。
- 21 關於如何榨取勞動力之問題的經濟邏輯，可進一步參考 Bowles and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and Michael Burawoy and Erik Olin Wright, "Coercion and Consent in Contested Exchange," *Politics and Society* 18: 2 (1990), pp. 251-66。
- 22 這裡陳述的觀點是，雖然在合作社這類事業裡仍有搭便車的問題，但解決該問題需花費的成本將少得多，因為工人在這個集體事業中涉及更多自身利害，他們會持續彼此相互監督。工人共同所有這件事也擔保了不同的一套關於勞動努力的道德規範，這將減少監控所需的成本。這類議題在真實烏托邦計畫系列叢書的第三冊中有廣泛討論：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Recasting Egalitarianism: New Rules for Communities,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Verso, 1998)。另外，也有研究從懷疑的角度檢視共同所有權能提升多少效率，請見 Henry Hansmann,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3 這些數據出自 Steffie Woolhandler, Terry Campbell, and David U. Himmelstein, "Costs of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9 (2003), pp. 768-75。
- 24 想更完整了解為什麼專利普遍來說無法促進發明，請參考 Michele Boldrin and David Levine, *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5 這裡涉及的議題是，有助於合作的利他或其他道德動機，能在多大程度上補充自利的動機。倘若一項動機的出現無礙於另一項的作用，那麼這兩項動機就是互補的。如果情況是如此，那麼在人們因為道德理由而合作的情境下，倘若又加入金錢誘因，那麼他們合作的動機將更強烈。反過來說，動機之間若是相互取代或矛盾的關係，那麼加入金錢誘因將減少道德信念的驅使力量。想知道自利動機如何排擠掉更多的利他動機，請參考 Sam Bowles, "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 'The Moral Sentiment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 *Science* 320: 5883 (2008), pp. 1605-9。
- 26 請見 Lane Kenworthy,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Illusory Tradeoff,"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7: 2 (2006), pp. 225-54。以及 *Egalitarian Capitalism: Jobs, Incomes, and Growth in Affluent Countr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7), chapter 4。
- 27 Stephen Jay Gould, "Wide Hats and Narrow Minds," in *The Panda's Thumb*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p. 151。
- 28 關於這個命題的討論，我大量得益於 Juliet Schor 的兩本書：*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以及 *The Overspent American: Upscaling, Downshifting and the New Consum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 29 經濟地位與快樂之關聯的相關研究回顧，請參考 Richard Layard, *Happiness* (New York: Penguin, 2005)。
- 30 國家服務——包括像水電、大眾運輸、醫療服務等，甚至像福利機構、監獄及教育等這類政府的重要服務——廣泛的民營化 (privatization)，算是部分商品化的例證，畢竟基本上，在這些例子裡，公權力仍在相當程度上規範前述服務的提供。
- 31 有些放任自由主義者認為，以市場來處理生養嬰孩能改善過程中相關人員的生活；貧窮的女性能大幅提升自己的收入；想領養小孩的妻子更容易找到可領養的嬰孩；嬰孩本身將過更好的生活；墮胎的數量也會減少。這樣的論點主張，既然每個人都從這樣的交換中獲益，為何要禁止呢？更進一步，有些極端的放任自由主義者認為父母對於自己的孩子擁有某種財產權，因此他們



應該擁有出售該財產的權利，一如能出售其他的財產。欲知捍衛以上各論點的討論，請見 Murray Rothbard, *The Ethics of Liberty* (New York: NYU Press, 1998), chapter 14。

32 至於可再生的身體部分不應該交由市場來交易，意見比較分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人血。許多人覺得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捐血公司沒什麼問題。然而，捐血研究通常指出，經由市場機制得到的血，就數量及品質來說，都要低於透過運作良好且仰賴（及強調）利他主義的非市場體系得到的血。請參考 Jane Piliavin and Peter Callero, *Giving Bloo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ltruistic Ident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d Kieran Healy, *Last Best Gifts: Altruism and the Market for Human Blood and Org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33 Milton Friedman 在 *Capitalism and Freedom* 一書中談論醫生時，也提出類似的論點。他認為應該要廢除官方授予醫師執照的制度，因為這樣一來，窮人就能夠取用成本較低的醫療服務。官方授予醫師執照不過是讓有執照的醫生壟斷這項服務罷了。廢除官方執照的制度，將出現由民間評判品質的服務，消費者到時候可以決定是要找索費較高而被民間評為服務較好的醫生，還是找比較便宜的醫生。

34 這份記述是基於 Mark Dowie 在此篇文章中所報告的研究：“Pinto Madness,” *Mother Jones*, September/October 1997。

35 「帝國主義」一詞有時被用來指涉帝國策略，藉由這種策略，一國征服世界上其他地方，並使之臣服為殖民地，或是成為廣大的多民族國家下的一部分。另外，它有時也被用來指涉全球經濟體系，在這類體系中，來自已開發資本主義世界的資本主義企業，在經濟上支配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經濟活動及資本積累。我用這個詞彙來描述國家策略與跨地域的經濟支配之間的相互交錯。

36 「地緣政治」在此指的是在一國際體系下，國家間競爭關係產生的動態情勢。各種過程造就了這種競爭關係，有些是經濟競爭，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但有些則是意識型態及文化競爭。例如，做為一種意識型態及文化過程的民族主義，可以推動國家的形成，也導致國與國之間的衝突，進而導致了軍事主義，此一過程有別於源自經濟考量的帝國主義。

37 已開發國家（特別是美國）使用軍事力量來對抗第三世界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常以下述的政治修辭來陳述：為了遏制蘇聯及中國，以免成為在地緣政治上對美國的安全威脅。在那個時代，地緣政治的敵對角力有所影響無庸置疑，但美國軍事介入——不論是以像在越戰中直接投入美國軍力的方式，或是以像在伊朗、瓜地馬拉、智利與其他地方支持軍事政變的間接手法——是在回應許多地方出現的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威脅。

38 透過人們熟悉的集體行動中「搭便車」問題的故事，我們可以清楚說明社群

意識如何降低合作的成本。搭便車的問題發生在個人能在不因參與了集體行動而承擔成本的情況下，自該集體行動獲益。在一個人人全然受自利驅使的世界裡，要排除這種搭便車的行為是成本高昂的，因為你必須施加很強的強制力或提供特別的誘因。當人們受到社群意識（共有的責任、互惠、相互照顧等）所驅使，搭便車便不會成為迫切需要處理的難題。

39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7).

4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41 G. A. Cohen, “Back to Socialist Basics,” *New Left Review* 207 (September-October, 1994), p. 9.

42 Adam Przeworski, “Self-enforcing Democracy,” in Donald Wittman and Barry Weingast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3 相信民主價值但同時也捍衛資本主義的人，常用以下三種方式來反駁這項批判：（一）唯一穩定的民主形式是受到限制的民主。人們對影響他們集體命運的各種事物都以民主方式普遍地控制，雖然理論上是件好事，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建立這種制度的嘗試，最後都會以失敗告終。（二）廣泛的民主是可能的，它也可以維持穩定，但會造成不想看到的效率喪失問題。效率與民主這兩種價值之間最適的取捨下，我們必須在基本投資決策中，移除直接民主的控制。（三）人們擁有按其意願處置他們財產的道德權利，以及人們擁有集體控制影響他們集體命運之決定的權利，在此兩種價值相互衝突。放任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各種理由中，都賦予第一項權利優先於第二項的地位（也就是說，在考量第二項之前，第一項必須先被滿足）。

44 許多作者已指出威脅不投資，已是資本主義民主下，資本做為結構性權力的關鍵形式。Göran Therborn 指出，國家對私人投資的依賴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特徵之一。Charles Lindblom 把威脅不投資視為國家被迫擔心是否創造了良好「商業氛圍」的根本原因。Joshua Cohen 與 Joel Rogers 把威脅不投資視為對民主政治「要求侷限」的核心：人民只能有效地要求那些能配合持續不斷的資本主義投資的事物。以上所有分析都揭示了民主如何受限於資本的力量。請見 Göran Therborn,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London: Verso, 1980);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Joshua Cohen and Joel Rogers, *On Democracy* (New York: Penguin, 1982)。















